



## 【论 文】

#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sup>1</sup>

谭其骧

翁独健同志要我在这次会议期间在大会上讲一通。我说，我不是民族史专家，有什么好说的？他说：“不要你讲别的，只要你讲一讲你们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是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同时存在的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你们是如何区别中外的？哪些算中国，哪些不算，标准是什么？”

他既然提了这样具体的要求，我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就不便推辞了。所以今天下午我在此向诸位汇报一下我们在这套图集里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把这个讲话命名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吧！诸位听了如果认为我们的处理办法有不合理、不妥当之处，欢迎在明天小组会上提出来大家展开讨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于1955年春。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

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迄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省范围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做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

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

这还要从“中国”两个字的意义讲起。“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且不提《诗经》等古籍中的“中国”是什么意思，简单说起来，拿“中国”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个观念是鸦片

---

<sup>1</sup> 这是作者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1991年第1期。

战争之后才形成的。在这以前的“中国”二字，在各种场合有各种样子的用法。远的我们不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这个观念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举一个例子，魏源写《圣武记》所用的“中国”，有时候是符合现在的概念的，譬如他讲到蒙古，把蒙古算中国，俄国算外国；讲到西藏，把西藏算中国，印度算外国。

但有的时候，他还采用一种老观念，把 18 省同新疆、西藏、蒙古对立起来，只把 18 省叫中国。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于因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他作笔记就把贵州、广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不看作中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内地看作中国。“中国”两个字，按照现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时候才形成。讲到“中国”就是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是鸦片战争后经过了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

我们再回头来讲，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这不是说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个时期的“中国”为中国。举几个例子：春秋时候，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这些国家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他们把秦、楚、吴、越看成夷狄，不是中国。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所谓“中国”。但是这个概念到秦汉时候就推翻了，秦汉时候人所谓“中国”，不再是这样，他们是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后一个时期推翻了前一个时期的看法。到了晋室南渡，东晋人把十六国看作夷狄，看成外国。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中国自居。这都是事实。但唐朝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唐朝人把他们看成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在宋朝也把辽、金、夏都看成是外国，看成夷狄。但是元朝人已经不这样了，已经把辽、金、夏跟宋朝一样看成“中国”。元朝人已经不用宋朝的看法了，难道我们还要作宋朝人？所以我们说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后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的概念否定，不采用前一代人的概念，这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的，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现在当然不应该再以东晋人自居，再以宋代人自居。总而言之，我们是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

第二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 18 世纪中叶以后，1840 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

为什么说清朝的版图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说清帝国扩张侵略的结果？因为历史事实的确是这样，清朝的版图的确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我们跟沙俄不同，沙俄在 16 世纪以前，和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中亚细亚没有什么关系，16 世纪以后向东侵略、扩张，才形成现在这么大的版图。但是清朝以前，我们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关系长期以来就很密切了，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东北地区在唐朝时候已经建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縻州。到辽、金时代版图已东至日本海，北至外兴安岭，经过元朝直到明朝的奴尔干都司，都是如此。北方也是如此，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西汉时跟汉朝打得很热闹，最后匈奴还是投降了汉朝，甚而至于到东汉初年还入居汉王朝的版图之内。唐朝，从唐太宗灭了突厥颉利可汗、灭了薛延陀、灭了车鼻可汗之后，一度统治整个蒙古高原，远达西伯利亚南部，几十年之后突厥才复国。元前的时候，蒙古高原是元朝的岭北行省。在西北方面也是如此，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元曾经置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宣慰司等等。虽然一般都不是连续的，但断断续续好几次，都跟中原地区在政治上属于一个政权。至于经济、文化关系，那就更紧密。这个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逐渐发展下来，

越来越密切。我们很赞成前几天翁独健同志讲的一段话，我们历史上中原王朝跟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主流是什么？是和平共处？还是打仗？我们看不必去深究它，确实有的时期是很好的，和平共处，有的时期是打仗，有的时期打仗还打得很凶。但是，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我看这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不够了，光是每一个边区和中原的合并也不够了，到了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

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清朝在完成统一之后，巩固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遭遇帝国主义从东南西北各方面入侵，给他们侵占了一部分土地去了，但基本上还是维持下来了。这是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需要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对中原人民有利，对边区人民更有利。我们知道，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主要是满、蒙、汉三区的统一。

汉族地区指原来的明朝的地方，除汉族外也包括许多南方的少数民族，蒙族地区在内外蒙古以外，还包括青海、西藏以及南疆的维吾尔地区。这些地区本来都在厄鲁特蒙古统治之下，都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当时的准噶尔疆域，不仅是天山北路的准噶尔本部，还包括南路的维吾尔地区，青海、西藏、套西厄鲁特，都是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噶尔丹还进一步侵占了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只有内蒙古在清朝入关之前早已纳入清朝版图。后来准噶尔又进一步要从外蒙古入侵内蒙古，这就爆发了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战争。双方经过康熙、雍正、乾隆70年的斗争，清朝终于取得了胜利。清朝不仅把准噶尔本部收入版图，也把原来在准噶尔统治之下的青海、西藏、“回疆”，即天山南路，也纳入了版图。所以清朝统一基本上就是统一满、汉、蒙三区。蒙区实际上包括维吾尔地区及藏区。这三区统一完成之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

而由满、蒙、汉三族人民组成这个王朝，实际上还远远在清朝入关以前。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臣下所进呈的劝进表就是由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充分表明这个王朝是由满、蒙、汉三种人组成的。据我来看，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到了16世纪、17世纪时，汉满蒙等中国各民族已经迫切需要统一。这一点，我们从明朝与女真部族即后来的后金打的交道，明朝跟蒙古打的交道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中原的明朝和东北的满洲、北方的蒙古，时而打仗，兵戎相见；时而通过和谈规定明朝岁赠女真、蒙古多少物资，并进行互市。打也好，和也好，目的无非是女真人要拿人参、貂皮来换中原地区的缎布、粮食和农具，蒙古人要拿他们的马来换中原布帛、粟豆和茶叶。岁赠互市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时，就打进来掠夺。一边进行掠夺，一边要挟举行新的和议，增加岁赠。这说明边区发展到16世纪、17世纪时迫切需要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当然，中原地区也需要边区的人参、貂皮、马匹等等。但是比较起来说，边区更需要中原的物资。所以说，通过互市，通过战争，最后需要统一。因为统一之后，只要中原能用布匹、粮食等物资满足边区的需要，就可以平安无事，统一就可以巩固下来。所以我说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统一的局面并且巩固下来，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的。

有人说，清朝这样大的版图完全是内外扩张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朝对于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穷兵黩武，就象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不能算穷兵黩武一样。汉武帝对付朝鲜、东越、南越，可以责备他是侵略，对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对付匈奴，匈奴要打进来。唐太宗对付突厥也不能算穷兵黩武。同样清朝对付准噶尔也是不得不然。在那时候，准噶尔气势汹汹，占领了整个新疆、青海、西藏、外蒙，矛头指向清帝国统治下的内蒙，如果不把噶尔丹打败的话那

还得了？那就可能再次出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即厄鲁特入主中原，再来一次改朝换代。要改朝换代可不是容易的。从当时情况看起来清朝还是比准噶尔进步点，让清朝统治中原地区比让准噶尔统治中原还是要有利一点吧。所以说清朝打败准噶尔，不能说他是穷兵黩武。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清朝把准噶尔统治的地区一一收入版图，这是为了彻底打垮准噶尔而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不是存心要去征服这些地方。

清朝那时候并不是扩张主义者。我们知道，清朝打败准噶尔之后，阿富汗、浩罕、巴达克山等中亚的一些小国，曾经一度要加入清朝，但清朝拒绝了，仅仅把这些国家列为藩属，以当时清朝的兵势、兵威所加，要进一步向中亚扩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清朝并没有这样做。可见清朝之所以有这样的版图，决不能说他是扩张主义者，这是顺应历史潮流。所以说清朝在 18 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有人主张拿今天的国土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认为那是不恰当、不应该的。要是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吗？事实上在清朝以前，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已有几百年是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的。再如大漠以北的蒙古高原，现在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不是历史自然发展形成的呢？不是。1911 年、1921 年两次蒙古独立，都是后面有第三者插手的，要是没有第三者插手的活，它不会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是蒙古地区不论漠南漠北部应该和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到了 20 世纪，到了 1911 年、1921 年，由于第三者的插手，结果分裂出去了。这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说历史上的中国只包括漠南的内蒙古而不包括漠北的外蒙古，尽管我们现在是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所有的北方民族，匈奴也好，鲜卑也好，柔然也好，突厥也好，回纥也好，全都是同时分布在漠南和漠北的。要是我们以今国界为依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那该怎么办？同一个政权统治之下的一个民族，漠北的不算中国，漠南的才算中国，这就没法办了。但我们要是采用 1840 年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范围就好办。出现在漠南漠北的蒙古以及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能因为今天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内就不算历史上中国的民族。当然，我们讲中国史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民族作为中国史上的民族。但我们也不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写它的历史的时候把这些古代民族写成它的先民。

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就是 1840 年以前有些跨国界的政权或民族或部族怎么办？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事例就是高丽。我们现在是这样办的：我们认为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这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插手。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等于我们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 5 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不仅它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

我们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的标准就这一条，并没有第二条。当初我们讨论的时候，正如昨天小组会上好几位同志的意见一样，有些同志总觉得只有这么一条不够，总想找到第二条、第三条，想要加一两条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总觉得应该跟中原王朝有一点点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怎么能说是历史上的中国？什么关系呢？最好有过郡县。但是有的边区从来没设过郡县，那么羁縻州县也算郡县。这也是过去学术界不实事求是之风造成的。那时历史学界讳言“羁縻州”，“羁縻”两个字不许提，硬要把“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的“羁縻”两个字去掉，变成某某州，要把它看成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一样。我们知道，府、州的长官是流官，是中央政府可以随时调动的。府、

州秉承中央政府的政令进行统治，向中央缴赋税，服徭役。但羁縻府、州只是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个都督或刺史的名义，实际上是当地基本上自主的统治者，他的地位是世袭的，王朝动不了它，它只是归附而已，你要动他他就会举兵叛乱。羁縻府州和正式府州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正式的找不出来，所以硬要把羁縻府州算正式府州。这在实际上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有些地区连羁縻府州也没有设置过，这些同志就去找称臣纳贡的关系，只要称过臣、纳过贡，就算是归入中原正朝的版图了。或者是曾经接受过中原王朝封赠的爵位，中原王前曾经封过这一部族的首领什么王，什么侯，或者是曾经授予一点什么官衔，那就把它说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的版图了。搞来搞去无非就是要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好象只有跟中原正朝扯上关系以后才能算中国，否则就不能算中国。这是讲不通的。我们知道，朝鲜、越南是历代向中原正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封爵的，但我们能把朝鲜、越南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吗？不行。它们跟明朝和清朝的关系只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它们不是明朝的地方、清朝的地方。尤其明显的是日本有一颗被奉为国宝的印，叫做汉倭奴国王印，按照这些同志的说法，日本已接受了中国给他的这颗印，岂不是日本也要算中国的了吗？可见把有没有封爵纳贡这种关系看作在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以内这种说法，是绝对讲不通的。

尤其突出的是，一定要把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才算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处理台湾问题就难了。台湾在明朝以前，既没有设过羁縻府州，也没有设过羁縻卫所，岛上的部落首领没有向大陆王朝进过贡、称过臣，中原王朝更没有在台湾岛上设官置守。过去我们历史学界也受了“左”的影响，把“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曲解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点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明以前历代中原王朝都管不到台湾。有人要把台湾纳入中国从三国时算起，理由是三国时候孙权曾经派军队到过台湾，但历史事实是“军士万人征夷州（即台湾），军行经岁，士众疫死者十有八九”，只俘虏了几千人回来，得不偿失。

我们根据这条史料，就说台湾从三国时候起就是大陆王朝的领土，不是笑话吗？派了一支军队去，俘虏了几千人回来，这块土地就是孙吴的了？孙吴之后西晋南朝隋唐五代两宋都继承了所有权？有人也感到这样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又提出了所谓台澎一体论，这也是绝对讲不通的。我们知道，南宋时澎湖在福建泉州同安县辖境之内，元朝在岛上设立了巡检司，这是大陆王朝在澎湖岛上设立政权之始，这是靠得住的。有些同志主张“台澎一体”论，说是既然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可见元朝已管到了台湾，这怎么说得通？在那么小的澎湖列岛上设了巡检司，就会管到那么大的台湾？宋元明清时，一个县可以设立几个巡检司，这等于现在的公安分局或者是派出所。设在澎湖岛上的巡检司，它就能管辖整个台湾了？有什么根据呢？相反，我们有好多证据证明是管不到的。因此，你假如说一定要与中原正朝发生联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明朝以前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行吗？不行。台湾当然是中国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因为历史演变的结果，到了清朝台湾是清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对台湾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明朝以前，台湾岛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高山族居住着的，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了明朝后期，才有大陆上的汉人跑到台湾岛的西海岸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就是颜思齐、郑芝龙一伙人。后来荷兰侵略者把汉人政权赶走了，再后来郑成功又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但是，我们知道，郑成功于1661年收复台湾，那时大陆上已经是清朝了，而郑成功则奉明朝正朔，用永历年号，清朝还管不到台湾。一直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湾，台湾才开始同大陆属于一个政权，所以一定要说某一地区同中原正朝属于同一政权，中原王朝管到了才算是中国的话，那末，台湾就只能从1683年算起，1683年前不算中国，这行吗？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高山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台湾自古以来是高山族的地方，不是日本的地方，也不是菲律宾的地方，更不是美国的地方、苏联的地方，台湾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地方。但不是属于中原王朝，是属于高山族的，到 1683 年以后中原王朝才管到，这样我们觉得就可以讲通了。一定要找出边疆地区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来，好象同中原王朝没有关系就不能算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对不起，还是大汉族主义。这个思想一定要坚决打破。

我们自己思想中如果认为一定跟汉族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那就不好办了。国外有人说，中国的西界到甘肃为止，新疆从来不是中国的。这个论点大家都知道是胡说。但是，为什么是胡说呢？

很多人就会这样讲了：因为新疆在汉朝就统治到了，唐朝也统治到了。汉朝设过西域都护府，唐朝设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但是我们的历史很长，西汉对西域统治多少时间？也不过 50 年吧。东汉的统治更差。唐朝比较长一点，也不过 7 世纪到 8 世纪 100 多年吧。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除了唐汉一二百年统治了新疆之外，其他的时代怎么样？有些人只愿意谈汉唐，不愿意谈其他时代，因为一想到除汉朝、唐朝、清朝之外，中原王朝的确管不到新疆。那怎么办呢？好象理亏似的，于是有的同志就去找其他的关系。说是虽然不能直接管到，但在宋朝、明朝新疆的地方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朝鲜、越南都不算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新疆地区的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就算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是讲不通的。宋朝和明朝，新疆地区政权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实在是很难的，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王朝跟宋朝怎么说得上有什么臣属、隶属关系？怎么能说是向宋朝称臣纳贡呢？不过是来往一二次而已，不用说不在宋朝的版图内，连藩属也谈不上。到明朝更可怜了，明朝中叶以后，嘉峪关打不开了，嘉峪关之外都是一些与明朝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权。所以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末新疆在宋朝、明朝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这样讲，不能说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清楚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在 1840 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么一条，没有其他标准。**新疆在宋朝的时候，是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等等。在明朝的时候，在察合台后王封建割据之下，分成好多政权，这是不是就不是中国了？是中国，不过它与中原王朝分裂了。

分裂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说来是扩大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是在秦汉时期，秦统一时北至秦长城，西边只到黄河，根本没有挨上青藏高原。汉朝的统一，西边到了玉门关，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扩大。隋唐的统一又扩大一步，但是都赶不上清朝的统一。一次一次统一，一次一次的扩大，到清朝的统一，版图最大。而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不过，我们说，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还需要政治统一来加以巩固的。所以讲到这点，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句话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少数民族对我们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除了经济文化方面我们暂且不谈之外，就是我们形成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我们设想一下，在 12 世纪我们这个中国分成七八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东北和黄河流域是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这一带是西夏，云南是大理，新疆是西辽，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许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个中国分成七八块，每一块中间还不统一。由于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才出现了一个大统一的局面，这个大统一的局面多么珍贵啊！譬如云南，虽然汉晋时代是中原王朝统治所及，但是南朝后期就脱离了中原王朝。到了隋唐时候，是中原王朝的羁縻地区，不是直辖地区。这个羁縻局面也不能维持很久，到了 8 世纪中叶以后，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根本就脱离了唐王朝。

南诏之后是大理。总的来说，从 6 世纪脱离中原王朝，经过了差不多 700 年，到 13 世纪由元朝征服大理，云南地区又成为中原王朝统治所及。又如新疆地区，从 8 世纪后期起就脱离了唐王朝，唐朝人被吐蕃又赶出来了，后来吐蕃人也站不住了，维吾尔人进入新疆建立了几个政权。

总而言之，经过了400多年，才由蒙古族征服西辽，使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又同属于一个政权。元朝的统治使中国各地区之间长期分裂又合在一起。没有蒙古的话，怎么能形成这样大的统一？这样分裂局面继续下去的话，那就不可想象。同样，在明朝时候，中国又进入一个分裂时代。明朝对东北辽东边墙以外，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我们要说老实话，现在把明朝对西藏关系来比之于元朝对西藏的关系，清朝对西藏的关系，这是不行的，是远远赶不上。明朝对东北边墙以外女真各部的关系也不能和元朝清朝相提并论。长城以外的鞑靼、瓦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明朝的时候中国又分成好几块了。没有清朝起来，这个分裂局面不知又要延续到什么时候。明朝对新疆的关系更谈不上，根本管不上，连新疆发生什么变化都不晓得。要是没有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6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就不会出现18世纪的大统一局面。所以我们说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

我们今天还能够继承下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虽然被帝国主义宰割了一部分，侵占去了好多地方），包括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在内，不能不归功于清朝。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很少数民族对我们中国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元朝，没有清朝，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能把中国看成汉族一家的？王朝跟中国不能等同起来，应该分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清朝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政权，我们绝不能说这个政权是中国的，那个政权不是中国的，不能这样分，要分也分不清。

历史上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中国政权时，那就得承认事实上当时几个国家并峙，谁也管不到谁，不能硬说中原王朝管到了边区民族政权。有些同志要把吐蕃说成是唐朝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唐和吐蕃敌对战争时多，和亲通好时少。就是在和亲通好时，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汉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纥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有时管到了历史上中国范围以外的地方，我们得承认这些地方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确在几个中国王朝版图之内。例如，汉晋间曾在朝鲜西北部设置过乐浪、带方等郡，汉唐间曾在越南北部设置过交趾、九真、日南等郡，这些设郡县的地方，当然是汉晋唐等王朝疆域的一部分。所以朝鲜、越南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历史上的乐浪、交趾等郡，则为汉、唐等王朝的领土，那是无可讳言的。以郭老名义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版（后来的版本改动过没有，我不知道），把汉朝同交趾、九真、日南的关系说成是对外关系，我看是很难讲得通的。这三郡明明在汉王朝的统治之下、版图之内，汉朝其他地区对这三郡的关系只能说是内地或中原对边区的关系，怎么能说成是对外关系呢？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我们对内提倡民族团结，对外提倡尊重邻国，特别是比较弱小的邻国，这是对的。但不应该，也不需要为了要尊重邻国，就抹杀或歪曲历史事实。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确在汉唐王朝疆域之内，不能因为在今天是越南的国土，便硬说汉唐跟这几郡的关系是“对外”。五代以后越南脱离中国独立建国，那我们就该尊重其独立，不能因为它曾经向宋、元、明、清等朝称过臣、纳过贡，而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邻国看待。

在我们的图上，我们没有把秦朝的象郡按我国的传统说法划在越南境内。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在画秦图时是在与越南友好的时候，所以就不敢把象郡画在越南。我们是把象郡画在广西、贵州一带的。他们说，我们现在要修订这套图，应该可以把象郡画到越南去了。实际把历史上的郡县画在哪儿，这是不能以对某个邻国友好与不友好来决定的。我们当初没有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我们是根据史料认真地作了分析，觉得还是不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更妥当一些。我们也知道把象郡放到越南去也有一定的史料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都说秦朝的象郡在越南。但是我们没有采用这种说法而主张象郡是在广西、贵州，我们觉得这种主张的根据更坚强一些。因为

《汉书·地理志》赶不上《汉书·本纪》可靠，而《汉书·本纪》的材料证明象郡应该在广西。《水经注》的材料虽然可贵，但《山海经》的材料比《水经注》更早一点。《山海经》的材料说明象郡应该在贵州。因此，我们是老老实实根据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以后才下结论的。我们决不能今天与这个国家友好了，就这样画，不友好了，就那样画。

……

所以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全国各个民族是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今天我们写中国史，当然应该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中国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我们今天的命运是相同的，兴旺就是大家的兴旺，衰落就是大家的衰落，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 【论 文】

# 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路径与模式<sup>1</sup>

于逢春<sup>2</sup>

**[摘 要]** 迄今为止，世界级前近代帝国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文化继承者能够凤凰涅槃且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者，惟有中国。与世界其他几个从大河流域崛起的世界级帝国的核心力量都是在帝国中心地带兴起，一旦灭亡，支撑着帝国的核心力量便随之冰消瓦解的情景不同，而古代中国的世界级帝国均形成于中原地带的边缘，他们为中国链条式世界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前仆后继的能量。虽然这些帝国建立者出身的民族（族群）各不相同，但维系帝国链条运作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论、“华夷共祖”谱系等古代中国文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关键词]** 帝国；五大文明板块；大一统；天下观；华夷共祖

## 一、在古代世界帝国废墟上浴火重生的现代世界大国

1970年，GDP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是10,255亿美元，排名第14位的中国是272亿美元，美

<sup>1</sup> 本文刊载于《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11期（2012年11月）。

<sup>2</sup>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史地、边疆学研究。

国是中国的 38 倍左右；2011 年，GDP 仍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是 15,065 亿美元，排名第二的中国是 6,988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 2.2 倍左右。历史回溯到清中期的乾隆时代，清帝国的 GDP 曾占世界的 40% 左右，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但自 19 世纪 30 年代末以降，清朝先是惨败于英吉利人，继而大大小小的殖民者与帝国主义者纷至沓来，大的如沙俄，小的如葡萄牙；远的如英国，近的如日本，无一例外地都曾欺辱过近代中国，并从晚清及民国时代之中国获得数量不菲的战利品。一时强盛的清帝国最终被淘汰出世界级帝国行列。但事过 170 年（1840~2010 年），今日中国作为清帝国绝大部分版图、人民与文化的承继者，正以现代大国之姿缓慢但却坚定地重返世界舞台，中华民族复兴之期，已经可望且可及。

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级古代帝国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继承者能够凤凰涅槃，比较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时间久远的如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莫卧尔帝国，近的如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等。这是因为上述世界级帝国的瓦解，或由于内部冲突而起，或因外部强敌打击所致。而这些瓦解后的帝国均没有内在动力使其重新崛起，不但在前近代没有，即使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也鲜有复兴者。这些帝国消亡后，其废墟上再也没有产生过一个类似的强大的前近代世界帝国或现代性世界大国，相反，这些地区均先后产生了多个政治中心、多个国家的复杂局面。

与上述帝国的“兴起-隆盛-衰退”仅有一个周期，且消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复兴过相比较，前近代中华帝国的历史却有例外性。譬如，在上述诸帝国中，即使将西罗马与东罗马帝国前后叠加，作为享国时间最长的帝国，但也只延续了近千年，仅有一个兴衰周期。古代中国虽然没有一个享国历史如此长的阶段性帝国，但却有着前后相继、嫡系文明传递的多个帝国链条，一脉相承 2000 多年。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 年建立了古代中国第一个帝国，嗣后，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先后崛起与消亡了许多阶段性帝国。在这诸多帝国链条中，每个世界级帝国的兴衰周期大都是四五百年，如由汉帝国（前 221 年~316 年）<sup>①</sup>，中经唐帝国（317 年~915 年）<sup>②</sup>，再到元帝国（916 年~1367 年~1632 年）<sup>③</sup>，最后到清帝国（1368 年~1911 年）<sup>④</sup>，大都如此。虽然这些帝国建立者出身的民族（族群）各不相同，但维系帝国链条运作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华夷共祖”谱系等古代中国文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那么，为什么单单古代中国能够拥有若干个前后相继的世界级帝国链条，并且获得了在 2000 多年时间里兴衰更替而不废的天赐际遇？这种例外性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路径之间是否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的话，中国疆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其路径是什么样式的呢？与其他世界性帝国相比较，前近代的中华帝国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

关于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与中国疆域的形成路径问题，笔者曾分别提出了“中国疆域底定于 1820 年说”与“构筑中国疆域的五大文明板块论”（简称“五大文明板块论”）。

所谓“1820 年说”，是从法理的角度探讨中国疆域究竟在哪个关键时间、在何处正式奠基问题。具体是指纂修于 1820 年<sup>⑤</sup>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及该志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熙帝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的界定与认知的理念。并且，还附着俄罗斯与西欧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因此，笔者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重修一统志》及该志所附“皇舆全图”所确定的领域。同时，1820 年的清朝疆域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的极点。该年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古代中国国势由强转衰的最后时刻。故笔者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该年。

所谓的“五大文明板块”<sup>⑥</sup>，主要是探究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途径及特点，探究构筑中国疆域的空间向度问题。具体而言，就 1820 年中国疆域的内圈与外缘的人文地理态势，亦即生产方式来看，如从公元前 3 世纪初以降匈奴与前汉分别统一游牧区与农耕区算起，大体上可粗分为五

种类型的“文明板块”。即（1）大漠游牧文明板块。自战国秦汉长城以北至贝加尔湖北岸，从大兴安岭、经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蒙古高原、天山山脉以北、至锡尔河流域以西一线，这片广袤的草原地带是游牧部族的天堂；（2）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从秦汉长城一线到南海与中南半岛北部，从巴颜喀拉山、横断山以东迄渤海、黄海、东海，这片土地加上夹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通过河西走廊与世界屋脊东麓下的黄土高原相衔接的南疆绿洲，是农夫的家园；（3）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位于大兴安岭山系、秦汉长城之辽东段、朝鲜半岛北部山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与外兴安岭山系之间的辽东地方，呈现着渔猎耕牧交汇经济形态，该板块最终于10世纪由辽朝初次统一；（4）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四周环绕着喀拉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川西高原、横断山、喜马拉雅山等高山的今西藏、青海全境与甘南、川西、滇西北，以及今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与印属拉达克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该地域呈现着高山地带适宜游牧、河谷地带有利农耕的生产方式，740年前后被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5）海上文明板块。沿着欧亚大陆的东缘，从堪察加半岛西南角下行穿过宗谷海峡，再偏西南行越过朝鲜海峡，途经台湾岛，傍加里曼丹岛，有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等若干个海域圈组成的系列链条。围绕着此诸海，自秦汉，特别是隋唐以降，以中国的官府与移民、海商与海盗、帆船与交通、货物与信息、渔民与捕捞等为核心，形成了若干个由人、物、信息、交通、渔场所构成的移动的空间。该板块至少从唐代开始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起着较重要的作用，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则开始左右中国社会进程。

这五种类型“文明板块”的划分，是根据底定于1820年中国疆域的自然地貌、人文地理态势与社会形态来推定的。这些原本历史渊源不同、文化传承各异的文明板块，经过数千年的相互撞击与攻防，彼此融合与和解，最终被溶合为一体。各个“文明板块”在不同的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同的。

可见，中国疆域的奠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她没有被完全“统合”前，经常存在着几个从不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起来的“文明板块”，并以此为根基建立各种各样的王朝，或单于朝、汗朝、赞普朝、王国等。它们或向着同样的目标前进，或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此历史发展的轨迹是多线式的。各个板块的统合为一，是其相互撞击、彼此交流、渐次统合的最终结果，这个硕果的瓜熟蒂落仅仅是190多年前之事。故从战国后期“天下一统”观念的发轫到这种观念变成现实，竟耗时二千多年之久。

尽管如此，以往人们谈论中国疆域问题时，莫不以中原王朝或中原文明为轴心，其他“文明板块”被有意无意间置于从属或陪衬地位，并且其他“文明板块”即使进入中原也常常被视为破坏中原“先进”的经济等。

关于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往往站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待此问题，出现“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中国乃汉族国家”等论调。国内学者也大都未脱出中原王朝中心史观的窠臼。

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视角，以长时段、大空间为研究对象，推断中国疆域形成的基本趋势与模式。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中国疆域底定的关键时间与“五大文明板块”的空间向度、（2）中国疆域统合粘合剂、（3）中国疆域形成的模式。

## 二、中国疆域底定的关键时间

关于中国疆域的范围与形成时间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始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当时不少学者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第一次讨论了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进而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疆域与形成时间论题。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可粗分为两类，即白寿彝提出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sup>[1]</sup>，孙祚民提出的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sup>[2]</sup>。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不少学者就中国历史疆域问题进行了第二次讨论。谭其骧、翁独健、杨建新等在上述的白氏、孙氏观点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1）“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说”<sup>[3]</sup>，（2）“各民族共同活动范围说”<sup>[4]</sup>，（3）“中原统一王朝疆域说”<sup>[5]</sup>。

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出，谭其骧用鸦片战争前100多年的历史时段作为中国疆域奠定的时间，使人难以搞清究竟哪个“关键时间”是中国版图最终形成的标志。除了谭其骧等之外，国内学者大都从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辽金、元明清等中原王朝的视角，描述中国疆域形成史，并未脱出中原王朝中心史观的窠臼。虽然国内学者们大都将进入中原的周边民族政权纳入叙事体系，但对没有定鼎中原的单于朝、汗朝、赞普朝，以及各类割据王朝、王国等，或忽略不计，或视之为外国，或将其置于中原王朝的附属政权或地方政权境地。

在笔者看来，惟有解答下列几个问题，才能判定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即关键时间究竟应设定在何时。即（1）清帝国是否具备或何时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与主权；（2）清帝国是否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与边境制度；（3）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是否存在着有意识的自我认定、法理确定；（4）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是否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等。对照上述几个基点，笔者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1820年。<sup>[6]</sup>

另外，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不管他们对中国疆域范围或奠定时间持什么样的观点，大都没有探讨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与构成的特点。另外，这些学者大都没有厘清构筑中国疆域的内在力量来自何方，也没有解明中国如此广袤的疆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另外，这些学者也没有论证古代中国的各地域与各民族在中国疆域奠定过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等问题。

## 二、“五大文明板块”的空间向度

### 1、“五大文明板块论”的构想基础

上古“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共同体或国家，从远古走来时就呈现出多民族（族群）的特质，中国历史上兴起的四个世界级帝国（汉、唐、元、清），都是由一个统治民族（族群）为主体、包含多民族（族群）的国度。任何一个统治民族（族群）的性格形成都离不开地缘因素。上述古代中国的四个世界级帝国崛起初期，都有自己的发祥地与核心文化传承及文明圈。嗣后，伴随着这些帝国的渐次强盛，或快速或缓慢地进入中原地带或原帝国的核心地带，并以此为基地征讨四方，号令天下。

实际上，笔者在考察中国疆域形成问题过程中，之所以提出了“五大文明板块论”，就是因为笔者在考察上述的汉、唐、元、清四大帝国的形成地域、文明渊源及其开国君主的出身民族（族群）时，看到了与以往的惯常思维截然不同的东西。以往的教科书等，经常在有意无意间倡导中原中心主义思想，以及汉民族先进于周边少数民族等历史观与价值观。

1949年以降，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大陆的确立，以往的旧史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旧史观”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隐隐约约地显现各种论著里，“中原中心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原中心论”的核心内涵大体系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发祥地；（2）中原文明是先进的，其他地区是落后的，是作为中原文明的辐射对象与接受者而存在的。该史观大致肇始于先秦后期，迄于民国，在中国社会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直至今日仍有相当数量的共鸣者。

从学术上对“中原中心论”进行“清算”肇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当时以顾颉刚等为首的疑古学派以抽筋剔骨式的方法，颠覆了经学家所构筑的“层累地造成的”三皇五帝时代，解构了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朝为以一贯之的正统王朝体系的神话<sup>[7]</sup>。同时，另一些史学家则主

张借助于已有的考古成果，跳出经学窠臼，从源头上梳理中国历史脉络。其中，徐旭生、傅斯年、蒙文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徐旭生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三大族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华夏文化。<sup>[8]</sup>傅斯年认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中原地带大体上有东夷、西夏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sup>[9]</sup>。蒙文通则运用区系类型学原理，认为炎帝、黄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三族渊源不同，分别出于江汉、河洛、海岱。<sup>[10]</sup>承继蒙氏、傅氏、徐氏三位先贤研究之余绪，苏秉琦于1975年提出了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他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各区系之间经过数千年的接触、交流、战争，逐渐融合，形成多源多流的战国七雄和多源一体的华夏民族<sup>[11]</sup>。

但不可否认的是，先贤们的着眼点大都没有脱离“泛中原板块”。即便如此，顾颉刚、徐旭生、傅斯年，特别是苏秉琦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却是“五大文明板块论”得以构想的思想火花触发器。那么，“块论”论说又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呢？这首先起源于笔者对“泛中原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奠定过程的实际地位的探讨；其次得益于笔者对汉、唐、元、清这四个世界级帝国的发祥地，以及开国集团核心成员出身地为什么大都在中原或旧帝国核心区域的边缘的理论思考。

就“泛中原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奠定过程的作用而言，在秦汉及以前，该板块曾利用其先发优势，对其他板块起到过主导作用。同时，各大板块最终被统合于“中国”的粘合剂——“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论、“华夷同源”谱系架构等也发祥于此。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三国时代以降，由于生活手段与生产方式的局限，从“泛中原板块”上孕育出来且由汉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往往善文治而乏武功，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不是表演者本身。

实际上，在中原地带由部落而古国、由古国而方国、最终到帝国的历程中，催动帝国诞生的力量并没有在狭义的中原地带产生，而是由夏、商、周、秦这些中原的“外来户”逐步完成的。苏秉琦认为这些“外来户”中的先周、秦与西部有关，夏则有源于东南方的线索，商人则认辽东为老家。正因为如此，“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sup>[12]</sup>。

但按照“中原中心史观”的逻辑，建立汉帝国的刘邦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大都应该在秦帝国核心地带——关中与中原。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大都出身于该地带的边缘——泗水郡。如果说刘邦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还大都在“泛中原板块”的话，其余三个世界级帝国——唐、元、清的开国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则均在旧帝国核心区域的边缘，乃至“泛中原板块”的边缘，其出身的民族(族群)也非汉族。

以往论说中国历史时，往往“汉唐”并论，以昭示其国力之盛。但李唐王朝的开国者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其创业与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纥豆陵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皆是鲜卑人<sup>[13]</sup>，人所共知，不待赘述。至于男系，虽然其姓氏好像是汉族的“李”氏，实则不然。《新唐书》说，李世民的祖父李“天赐生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周闵帝受魏禅，虎已卒，乃追录其功，封唐国公，谥曰襄。襄公生昺，袭封唐公，隋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sup>[14]</sup>。无论是北周，还是西魏，皆为突厥化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王朝，其具有世袭贵族性格的“八柱国”从来都没有汉族出身者。在这一点上，李氏与同为北周与西魏贵族及“八柱国”、并拥有血亲关系的隋文帝杨坚家族相同。李渊的本姓，据《旧唐书》说：其“皇祖讳虎，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仍赐姓大野氏”<sup>[15]</sup>。这里披露出来的信息是“仍赐姓大野氏”之“仍”字，“仍”者，一仍其旧也。也就是说，

李渊的祖先本姓大野氏或其他胡族姓氏，后来改为李氏，而今周文帝又将其本姓——大野氏复赐予之。类似记载还有很多，此不赘述。关于杨氏、李氏的男系家族，退一万步说，即使像后来他们自造家谱所标榜的那样——分别为陇西李氏、弘农杨氏，但至少说明他们在北朝时业已胡化。无论是从血亲上，还是文化认同上，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其出身或认同胡姓的干系。为了揭穿此事，陈寅恪考证出李渊、李世民自称其先世出自西凉李暠之正支后裔纯系捏造，并“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而“初古拔或车辂拔乃当日通常胡名”<sup>[16]</sup>。实际上，早在唐宋时代人们都知道此事，故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sup>[17]</sup>。

就唐帝国的制度文明而言，李唐王朝的核心文物制度系承继其本民族——鲜卑族创立的北朝而来。对此，陈寅恪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sup>[18]</sup>正因为如此，杨氏隋朝、李氏唐朝的一系列体制，如经济上的均田制、政治上的任官与选举之权归属中央、军事上的府兵制、官吏选拔上的科举制等，皆是以往汉族王朝所没有的制度。又因李唐王朝创业者君主身上流淌着胡人的血液，使得他们既有着农耕出身的汉族君主所不具备的尚武精神与进取性格，也有着汉族出身君主所不容的“收继婚”（如唐高宗李治娶其后母武曌）等胡人风习。

元、清王朝皇室及该二王朝的开国集团分别出自蒙古族与满洲族，二王朝的发祥地分别在金王朝的岭北界壕边、明王朝的辽东边墙外。也就是说，取代没落的金、明帝国的元、清帝国是在原金、明王朝政治秩序的边缘发展起来的。联想此前的汉帝国发祥于秦帝国核心区域的边缘、继承了北朝的唐帝国开业君主先祖及核心集团成员先祖出自长城外的蒙古草原与辽东的西部等史实，使得笔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疆域形成的真实脉络与动力源泉问题。历史的事实是，汉、唐、元、清，特别是元、清这两个世界级帝国的创立均是在原有帝国秩序圈的边缘完成的，这两个新建立的帝国不但分别将其发祥地（大漠板块、辽东板块）带进了崭新的帝国秩序，而且在征服了原有帝国疆域的同时，还开拓了新的疆土。凡此种种，莫不使笔者对以前所接受的——中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汉民族比周边少数民族先进等史观产生怀疑。于是，笔者将目光转向了与中原文明渊源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更有别于中原的其他地域。

## 2、五大文明板块的基本样态与发展趋向

### （1）冒顿单于：大漠板块的最初统合者

关于游牧经济何时形成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根据考古资料，在蒙古草原，至少在 4000 多年前，作为游牧文明象征的马，业已家畜化。但在欧亚草原地带卷起狂飚，两千多年来给旧大陆带来一波又一波巨大冲击的成熟游牧文明的出现，却是公元前 9~前 8 世纪之事。此后，无论是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还是中部，抑或是西部，均相继出现装备了青铜马具与武器的游牧部族，次第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历史上最初留下盛名的骑马游牧部族，在草原地带的中部为塞人，在东部则是迟后几个世纪出现的匈奴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塞人与匈奴人的光辉业迹之所以能名传千古，是因为东西方双峰并峙的两大历史学家分别予以纪录之故。这便是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及其不朽的巨著——《历史》与《史记》。有意思的是，二人虽分处东西方，时代不同，语言不通，更无法交流，但彼此所描述的对象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游牧民的移动性与生存条件紧密相连。根据 20 世纪初的现地调研资料，在精耕农业区的江南，一二亩良田就能基本上解决一个五口之家的吃饭问题，但即使在水草丰茂的陈巴尔虎右旗游牧区，一个五口之家必需的放牧面积则至少为 22,860 亩左右，且这个牧场还是游动的<sup>①</sup>。在该游牧地带，正常年景至少需要移动 8~10 次。至于每次移动距离，由于受旗地制度的限制，蒙古游牧民的移动空间业已大为缩小，即便如此，近者一次需走 42~53 公里，远者达 265 公里左右<sup>[19]</sup>。生活在这样不确定的自然环境中，人畜惟有不间断地移动，才能获取生存资源，从而也因此增强了游牧民突破其他社会“边界”的能力，形成了与定居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判断尺度与思维方式。

游牧民因移动性而衍生的快速机动性与瞬间集聚性，造就了游牧世界对定居农耕世界的军

事优势。自公元前 750 至前 700 年间中亚及南俄草原出现了斯基泰 (Scyths, skythai) 人游牧铁骑, 直至乾隆皇帝于 1755 年击败准噶尔部, 在长达 20 多个世纪中, 诞生于大漠板块上的马上弓箭手们对定居地带的农夫们一直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对古代和中世纪而言, 马上弓箭手们投射的飞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 全副武装的可轮流换乘的马队既有开路护体的价值, 又有着步兵不可比拟的速度。这一兵种, 在面对冷兵器时代的定居民时, 其战斗力与摧毁敌人士气的威慑力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迨至近代, 面对由农夫们组成、手持长矛大刀的太平天国军, 特别是在遭遇了游荡在黄淮平原上的捻军时, 曾格林沁马队曾为游牧铁骑的荣誉做过回光返照的一击。但当 1860 年曾格林沁的马上弓箭手们在京东八里桥面对着近代欧洲的火炮填充手、火枪射手们的时候, 那西洋大炮的隆隆声便毫无悬念地终结了一个长达 20 多个世纪的世界历史时期。

公元前 3 世纪初, 匈奴冒顿单于即位后不久, 臣服东胡、击走月氏。同时, 南并楼烦, 夺回被秦占领的河套及阴山一带, 北服丁令等部。进而于公元前 200 年大败刘邦 32 万大军于白登。嗣后近 70 年间, 汉朝不敢与匈奴争锋于长城内外。于是, 冒顿单于凭借快捷的骑马兵团, 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 第一次统合了长城以北、西伯利亚以南, 东起辽河、西至葱岭以西的“大漠板块”。而此时, “泛中原板块”尚未最终统一。

匈奴之后, 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先后依靠该板块建立若干个“北朝”。与此同时, 具有突厥与鲜卑双重血统的李氏唐朝, 承“北方汗庭”之余绪, 第一次使“大漠板块”与“泛中原板块”实现了完全的统合。元朝则以“大漠板块”为基地, 第一次统合了古代中国的陆上板块。

可见, 该板块在构筑中国历史疆域的过程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 (2) 汉武帝：“泛中原板块”的奠定者

“中原”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前者大体上指今日河南, 后者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笔者所界定的“中原”还有“大中原”与“泛中原”, “大”者指秦朝统一的地域, “泛”者指汉武帝及其子孙统一的疆域。

公元前 21 世纪夏代, 在“泛中原板块”上有“执玉帛者万国”。嗣后, 经过 10 个世纪的互相攻战、彼此融合, 到了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在位时, 中原尚有八百诸侯。春秋初年, 犹有五十余国, 至战国中后期, 尚余七雄。到了秦始皇登场, 灭六国, 首次统一了中原。就居民族属而言, 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 夷夏共同体——汉民族在秦汉帝国时期最终形成。

在该板块上, 如果从公元前 21 世纪夏朝算起, 到公元前 100 年左右汉武帝的征讨事业尘埃落定, 经过近 2000 年的漫长岁月, 由夏启开辟、经秦始皇初步构筑、再经汉武帝再拓展始告奠定。随之而来, 真正意义上的“南朝”也呱呱坠地。继西汉之后, 东汉、曹魏、西晋、具有突厥与鲜卑双重血统的隋, 以及宋、明等先后依靠此板块建立了若干个“南朝”。

汉武帝构筑之“南朝”与冒顿单于构筑之“北朝”, 形成了南北朝, 双方既对峙, 又相互承认。其后, 中经东汉-匈奴、东汉-鲜卑、西晋-鲜卑、北朝-南朝、隋-突厥、北宋-辽等、南宋-金等、北元-明、瓦剌-明等, 迄至清中期, 中间只有唐朝短暂、元朝近百年统一过南北朝, 其余时间大都处于南北分治状态。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许多地域被本文划归到“泛中原板块”, 但这只是从中国古代历史大的方面和总的趋势来界定的。譬如西南地区、辽东半岛、西域地区的文明, 有时或经常与“泛中原板块”有所区别, 此不赘述。

## (3) 松赞干布：雪域板块的缔造者与“西朝”的奠基人

据信史记载, 公元 6 世纪后半, 活动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吐蕃部落开始强大, 渐次吞并临近部族。7 世纪初, 松赞干布承继父祖之业, 东征西讨, 君临整个青藏高原。到赞普赤松德赞时, 吐蕃已是东接今四川西部、甘肃西部, 南邻天竺, 西占西域, 北抵突厥, 地方万余里的强大赞普朝。

763 年吐蕃攻陷长安, 立李唐子孙为帝, 设年号, 大赦天下, 署置官员, 但不久因天气炎热而主动撤退。嗣后, 唐、蕃皆有罢战之意。于是, 双方于 783 年商定在清水会盟, 划分疆界: 靠

近唐朝首都长安的陕西西部、整个甘肃与宁夏的大部分也收归于赞普帐下。

821年，唐朝为了减轻压力，又与吐蕃会盟于长安王会寺。盟词曰：“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塞山崇崇，河水汤汤，日吉辰良，莫其两疆，西为大蕃，东实巨唐”<sup>[20]</sup>。与《旧唐书》这段盟词相互参照、可彼此印证的还有至今仍耸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其碑文曰：“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中略）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以东，大唐祇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sup>[21]</sup>。

此时此刻，唐蕃双方彼此承认各为东、西方之主。按照当时的“中国”景况，可以说，唐朝与吐蕃实际上构筑了古代中国的“东朝”与“西朝”，双峰并峙。然就实力而言，西朝睥睨东朝之态，跃然纸上。

但吐蕃王朝统一雪域板块还不到百年时间，嗣后，该板块内部再也没有产生过统一力量。这是因为雪域板块内部大体上可分为以农业与半农半牧为主的卫藏、以游牧业为主的安多、以半农半牧为主的康巴三个文化单元，特殊的地貌造成了同一文明区域内的农业与游牧业生产方式的二元分离。不同的生产方式衍生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即使在同一个地理单元中，每一个高山深谷又程度不同地形成了在谷底冲积平原与缓坡上种植青稞、小麦与油菜等农作物，在山上游牧与狩猎的经济形态。在藏语中，生活在河谷地带的藏人（Yul 或 Rong pa）被称为低地农夫；游牧在高山草原地带的藏人（aBrog pa）自称为高山草原牧人。从而使得一个山谷上下分别衍生出了以游牧与农耕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

由于定居农业与游牧社会的二元分割，不但彼此难以统合，即使农耕区与游牧区内部也是四分五裂。正因为如此，吐蕃统一王朝崩溃后，该地域任何一个政治势力的崛起，都离不开外来势力的扶持。同时，藏传佛教能够充分发展，也得益于这种羸弱的经济与割裂的政治局面。由于政治与经济、文化与族群、地缘与生活方式的紧密关联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藏历史的发展自松赞干布赞普以降，始终具有强大的东向性。对此，石硕提出了西藏种族与文化东向发展说：“在西藏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事实：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的文明无论在地域空间上或是种族与文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sup>[22]</sup>。无论是统一吐蕃时期迎娶文成与金城公主、占领陇右、陕西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在长安建立短期政权，还是蒙元时代阔端与藏传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八思巴及萨迦派领袖世代被封为大元帝师，抑或明朝时期设河州与朵甘及乌思藏三卫、1578年阿勒坦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的仰华寺会晤、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乃至清代五世达赖喇嘛晋京、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乾隆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等，莫不验证此倾向。这种既不南下进攻极易得手的恒河平原及南亚-东南亚，也不西进获取印度河平原及中亚-南亚的态势，使得崛起于“大漠”与“泛中原”及“辽东”诸板块上的政治力量的影响力始终对其起着决定性作用。有鉴于此，美国学者卡拉斯科说：“从西藏历史的开篇之时，西藏就以不同的方式蒙受中国人的影响”<sup>[23]</sup>。

在雪域高原上崛起的统一吐蕃王朝曾一时间入主中原，立马灞上，惜因时令等原因而最终丧失了君临天下之良机。但统一吐蕃将原本各自政治独立，生产方式与文化传承乃至族群构成迥异的雪域高原统合为完整的社会共同体，使“雪域板块”从此作为一支聚合的力量横空出世，与李唐王朝争霸天下。统一吐蕃瓦解后的藏传佛教通过宗教的力量将“雪域板块”的一体性延续下来，妙用文化力量参与并深刻地影响着元明清三代的中国疆域构建历程。

#### （4）“辽东板块”的逐次崛起

“辽东板块”的南部与西南部，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渔猎业；以今长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部地带，是农牧渔猎混合业；西部以畜牧业为主；西北部与北部以游猎业为主；东部与东北部地区以渔猎经济为主。上述不同经济类型的大体布局，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中期，大体上一直被延续下来。

与这四大经济类型相联系的是东北地区的濊貊、肃慎、东胡、汉族四大族系。将“辽东板

块”初次统合为一体的为辽朝。由本土力量将该板块最终构筑成型的应属女真人及其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2 世纪初期，渔猎耕牧于松花江干流南岸支流——阿什河领域的女真完颜部，仅用 10 多年时间，便消灭了辽、北宋，把领土远远地拓展到淮河流域。引导金朝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其独具特色的国家体制。而金朝最有魅力、最能体现通古斯系民族特色的体制，莫过于集军事、行政、生产为一体的“猛安、谋克制”。就军事而言，与猛安谋克制密切相关的是骑射与围猎习俗。

逮至清朝入关，为了保持八旗骑射的传统，延续通古斯系民族固有的骑射与围猎习俗，曾对东北与内外蒙古进行封禁。清帝国藉不满 10 万将士塑造了陆疆 1300 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域与众多的属国或属部尚不计在内的强大帝国，莫不依托其基干的、在“辽东板块”上铸造出来的铁骑。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人在入关前就汲取汉文化，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在创立与巩固后金（清）政权过程中，大力采纳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清皇室的汉文化修养之高，不仅远远超出少数民族皇室，即便是历代汉族皇室也罕有出其右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满洲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这对他们汲取与农耕文明密切相连的汉文化，提供了心理的与现实的保障。

可见，“辽东板块”与“大漠板块”是有区别的。前者兼有渔猎游牧与农耕文明二者之优势。其强悍与擅骑射乃渔猎游牧民族之所长，此乃优于农耕民族之处；其不亚于农耕民族的文功，得益于其本身固有的农业传统，此乃优于纯粹游牧民族之处。

在“辽东板块”上兴起的最早的强盛政权当属建立于公元前 37 年的高句丽，次则为树立于 698 年的渤海。而首次将“辽东板块”势力扩展到中原腹地的应属女真人及其建立的金朝。金朝灭亡后 350 年，即 1583 年女真人后裔努尔哈赤起兵辽东深山，经其祖孙 7 代，历经 230 多年的努力，始以辽东一隅之势，继举全国之力，所经何止数百战，终于缔造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帝国，最终于 1820 年将中国五大“文明板块”真正统一。

#### （5）“海上板块”的形成与内敛

人们以往考察中国疆域问题时，经常将视点落在陆地上，今日看来，这明显是不充分的。围绕着前述的诸海域，位于其周缘的国家与地域及其交易城市相互影响，构成了历史性的重要海域交易圈。在各交易圈的交错地带，形成中继都市，这些中继都市的市场相对整备，并形成商人居住区，发行通货，交易条件较为完善。这些连锁的海域与朝贡贸易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海域圈在连接着“陆”的地域圈的同时，还保持着独自性。

所谓“独自性”，是指海域世界的组织原理是对人主义的网络性社会，呈现出相互协调的多种族性、多文化性，具有流动性、商业指向性、多样性等特色，成为有别于“陆”域的秩序空间。

古代中国人在距今 5000 年左右就已能畅通无阻地横渡渤海海峡，至少在 4 千年前的殷商初期已出现了帆船。西汉航海家开辟了从南海到印度洋东部海域的航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航海家不但开辟了南海直达波斯湾航线，而且还有慧深和尚扶桑国之航。进入隋唐时代，唐帝国除了维持与日本之间的原有古老航线外，渤海人开通了多条从今海参崴等地到日本各地的日本海航线；黑水靺鞨人开辟了从库页岛到堪察加半岛的鄂霍次克海航线。同时，唐帝国船队直航阿拉伯海与波斯湾，抵达红海与东非水域，纵横驰骋于北印度洋上。经过唐宋两代 600 多年的持续发展，古代中国的航海事业到了元朝臻于鼎盛，明初达到巅峰。嗣后，古代中国的官府与民间势力虽然渐次退出印度洋，但在东亚海域仍然维持着主导地位，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如果以 19 世纪初期富尔顿发明汽船为分水岭的话，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帆船曾以无与伦比的优势，在东亚诸海域乃至北印度洋上纵横驰骋了近 2000 年左右。

故弗兰克说，从 1400~1800 年，中国不但是东亚海上贸易的中心，“而且在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些

白银“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sup>[24]</sup>。

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松浦章将17~19世纪的黄海、东海、南海称为“清代的海洋圈”<sup>[25]</sup>。国际知名学者滨下武志氏是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海上事业的：“自14、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逐渐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及以此两个贸易圈为两轴，中间夹以几个贸易中转港的亚洲区域内的亚洲贸易圈。欧美各国为寻求亚洲的特产品，携带着白银也加入到这个贸易圈中来”<sup>[26]</sup>。

由是观之，明清以后的海上板块之构筑，海商与贸易、帆船与移民、海上交通与海盗是起了主导作用的。虽然得不到政府的强力支持，但清朝的海上贸易事业还是有所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承认，清代早中期所形成的海洋圈，应该说是大陆的自然延伸部分，还是陆地中心主义的产物。但经过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的六次关于“海防”、“海权”大讨论，清廷朝野对海洋、海权的认识已相当深入，具有一定海洋意识与海洋思维的“海上板块”脱颖而出。

### 三、中国疆域统合粘合剂：“大一统”思想、“华夷同源”谱系、“天下观”

#### 1、“五大文明板块”的粘合剂——“大一统”思想

就“大一统”思想而言，该思想肇始于战国时代的孟轲，中经董仲舒、司马迁的诠释，再经李世民的实践，特别是司马光的理论升华，最终定型于蔑里乞·脱脱、爱新觉罗·胤禛等。司马光曾对大一统之内核有过辨析：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

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

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sup>[27]</sup>

司马温公从理论层面上诠释了“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实际上也是在为崛起于其他“文明板块”上的各政权入主中原正名。“大一统”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通过历代有识者的努力，他们把难懂的、学术性的，而且常常是朦胧混乱的哲学转变为明白易懂的语言，最终简化为标语口号。所以，虽然在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领土观。耐人寻味的是，在两千多年中，无论是出身于中原的汉族统治者，还是入主中原、出身于边鄙地带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均以孔子为导师；在统治国家的意识形态方面，各个“文明板块”都没有出现什么新的理论。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个领袖企图去寻求以新的统治逻辑，并以此为基础，实施有异于其他领袖的地方自治或独立体制。他们心中的国家疆域模式始终是统一的帝国，尽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统一的帝国”是想像的或理念之物。随着“大一统”思想渐次成为“五大文明板块”上各种政权的共通意识形态，各个板块上的人们也随之逐步累积了实践“大一统”思想的物质基础。

#### 2、“天下”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之间的重合

在古代中国，与今天意义上的“国家”一词相对比较接近的汉语词汇当为“天下”。至少从战国中期以降，该词语就已经在比较确定意义上被使用了。此后直到清朝中后期，大都是作为从空间意义上概括性定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或地理认知范围的词语而出现的。

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通过探究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所编纂的经书等典籍及其时人对这些典籍的诠释，认为这个时期“天下观”的特点是“扩张的天下”。同时，渡边氏认为作为比较成熟

且确指政治共同体空间的“天下”一词，出现在战国中期，到了前汉末期趋于定型。天下的领域也从方三千里，进而到方五千里，最终达到方万里<sup>[28]</sup>。

前汉以后，许多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即便如汉唐这样强大帝国的史学家，也大都将天下与郡县等同起来。如班固是这样描述从周朝到秦朝的领域的：“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汤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sup>[29]</sup>。即秦朝兼并七国后，七国之地变成郡县。在此，天下与郡县相互重叠。

关于唐朝玄宗时代的疆域，《旧唐书》是这样界定的：“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sup>[30]</sup>，即十五道的总和为天下。《资治通鉴》是这样表述的：天宝元年，“天下生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sup>[31]</sup>。也就是说，唐朝的天下领域为三百三十一个直属州与八百个羈縻州之总和，而且这个天下不是无限伸展的，故有边境。

应该说，古代中国的皇帝统治是通过版籍来实现的。即运用户籍制度，将臣民固定于不同的区域，通过郡县机构予以统治。而天下作为皇帝所能直接支配的领域，是被限定于郡县制所及的有限范围之内的。

但另一方面，与史学家的客观记述历史不同，经学家们基于儒家经典所提倡的德治观，认为古代中原王朝皇帝还对周边夷狄负有德治之责。皇帝通过版籍来支配的天下是有限的，但通过德来支配的天下就有无限拓展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原王朝皇帝始终以上述两种传统支配方式的相互作用为基础。渡边信一郎认为，天下观之所以具有单一政治社会型面貌与复合型社会面貌这两个侧面，也正缘于此。天下型国家是以存在成为天子德治对象的夷狄（四海）为其成立条件的。

渡边氏认为，天下=中国说，与天下=世界·世界帝国说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列阵于鸿沟两侧的分别是国民国家论与帝国国家论这两大阵营。国民国家论是对诞生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并概念化的产物；而帝国概念则缘于欧洲古典时代，是从其与资本主义经济间的关系出发，论述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国家论。对于前近代中国之天下，用源于欧洲的国民国家概念与帝国概念来诠释，首先需要直面的是适用是否的问题。不可否认，前近代中国之天下与天下理念，与国民国家概念及帝国概念之间，确实跟任何一个都很相似，但又都不太像。在中原生活或入主中原的人们，是把天下作为国家（被政治性编成的社会）来表达的，同时将其理想样态视为“天下大同”之世。换言之，在前近代中国人那里，天下是有两个不同的境界的，即现实的天下与想象的天下，前者是指王朝本身所能管辖的领域，后者是作为理想之物，是可以无限放大的。由此可见，清朝中后期以前的所有王朝，均不能等同于嘉庆 25 年奠定的中国=天下。

以往，许多深受儒家经典影响的古代中国读书人常以所谓中华之世界秩序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在理论上，这个秩序至少应有三个方面是层级的：中国是核心（内）的、伟大的、文明的；而蛮夷是边缘（外）的、渺小的、野蛮的。但只要认真地梳理一下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能够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华中心之世界秩序，只是许多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相互传承，长时段地建立起来的一个主观的“虚构”。

就古代中国汉文化传统而言，譬如孔子在修《春秋》时，他既把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渗入其中，使得这个思想在以后二千多年里影响了数十代士大夫与儒家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王者无外”，无形中给后人增添了许多想像的空间。所以，讨论以汉族为主的古代文人所声称“天下”时，应尽可能厘清“虚幻”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同时，在前近代中国，文化的分界与政治的疆界之间，经常是不一致的。应该说，“天下”与“中国”之间的最终重合，已是 1820 年以后的事。

### 3、“华夷同源”谱系

大一统思想也好，天下观也罢，它们更多的是从哲学的层面来阐释中国疆域构造问题，唯

有《史记》从血缘、谱系入手，从华夷同源视角，构筑了大一统思想体系。笔者曾就此问题撰文阐述，兹概述如下<sup>[32]</sup>。

春秋时期，齐、鲁、晋等中原诸侯自称为“华夏”，位处中原外缘的秦、楚、吴、越等，则被称为“夷狄”。进入春秋晚期战国初期，伴随着秦、楚等夷狄诸国的强大与问鼎中原，它们也随之跻身于“华夏”之列。与此相呼应，“夷夏之防”的观念也被抛弃。不消说，“华夏族群”边界自然随之扩展，部分夷狄族群被化成或自化成华夏族群。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夷边界大移动乃华夷变态的第一波，第二波则随着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最终达成。因为此时的汉朝已是“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的华夏帝国，帝国内部充斥着夷狄族群，帝国边缘环绕着夷狄部落或国家，汉朝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这些夷狄族群、如何与这些夷狄部落或国家相处的问题。诞生在这种境况下的《史记》，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借助于已有的历史素材，加之自己的远见卓识，将夷狄族群与华夏族群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构建。那就是司马迁对夷狄、华夏族群的族源予以“源出于一，纵横叠加”的架构。如前所述，“源”则为黄帝，就“流”而言，黄帝后裔除了华夏族群之外，还有秦、楚、吴、越，进而涵盖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蛮夷族群。

在古代中国极具宗族色彩的社会环境中，族群性始终被体验为一种血缘现象，即一种在自我的持续以及在几代人之间共享祖先联系的持续。所以，当司马迁构筑“中国”大一统思想框架时，建构华夷一体、华夷共祖认同的历史体系便成为最紧要的一环了。因为没有华夷界限的移动、没有华夷共祖的认同，天下一家、四海如一的“大一统”便无法架构。即使勉强架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应该说，司马迁所架构的华夷共祖认同体系，或许反映了华夏知识分子或官方单方面的意向，但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不同，族群可以被外人来辨别和认定，并且不必有自我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构筑的华夷共祖认同体系，不但为华夏族群所认同，而且为夷狄族群所认同，进而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之夏与刘渊之汉、鲜卑人之前燕、南凉、北魏、西魏等政权，莫不以黄帝之裔自居，并以此作为入主中原的法理根据。

## 五、中国疆域底定的必然性与中国疆域形成模式的例外论

在人类历史上，世界性的帝国肇始于公元前 2000 年代后期的尼罗河流域，埃及帝国一时间地跨西亚北非；形成于公元前 1000 年前期的亚述帝国，首次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两大文明地区囊括了进来。时间距今最近的拿破仑帝国崩溃于 19 世纪初期。期间，许多世界级帝国兴衰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迄今为止，除了中国之外，还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级帝国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文化继承者能够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就此点而言，中国前近代国家形态，特别是疆域构造与形成路径是独特的，是例外的，欧亚所有的世界级帝国的历史经验都无法在此得到验证。

但这种例外性并不意味着前近代中华帝国的形成缺乏历史必然性。恰恰相反，前近代中华帝国的性格、疆域构造与奠定路径是东亚特定的地理态势下、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特别是特殊的文明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这种特殊性在于前近代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圈。经过数千年的交流、融合，到了公元前 200 年左右冒顿单于统一大漠游牧区、公元前 100 年左右汉武帝统一泛中原农耕区，“五大文明板块”的初步轮廓开始显现。嗣后，再经过漫漫两千多年，原本历史渊源不同、文化传承各异，特别是生产方式相差较大的 5 大“文明板块”最终溶合为一体。期间，各个“文明板块”上兴起的势力有如接力赛，前后相继，先由边缘兴起再逐鹿中原，尔后再向周边拓展，最终于 1820 年完成了中国疆域的统合。而其他

所有世界级帝国消亡后，其废墟上均先后产生了多个政治中心，旧帝国文明往往冰消瓦解，出现了多个国家的复杂局面。

就古代中国疆域的奠定路径而言，“五大文明板块”都先后与不同程度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它们置身于缔造古代中国疆域的接力赛之中。期中，最先崛起的是“大漠板块”与“泛中原板块”。

就“大漠板块”来说，蒙古草原处于比较恶劣的气候带上，冬天是西伯利亚酷寒气候的延长地带；夏季的草原是戈壁滩炎热气温的纵深地域。那里几乎是10年一次的冬季暴雪或春季旱魃，导致牲畜死亡或牧草枯萎。此时，游牧民往往将目光投向黄河流域肥沃温湿的土地。况且游牧业属于单一经济，它需要农耕区的粮食、茶叶、铁器、各类日用品等来支撑其生存。在这种状况下，游牧民对农耕区的定期性推进便成了一条自然规律。这些草原之子，莫不属于头脑清醒、身强体壮与注重实际者。当农耕区政权腐败无能时，快如飓风的铁骑每每轻易地将其征服，他们成了“泛中原板块”的皇帝。毋庸置疑，这些征服者不但带来了固有的文化，而且还不同程度地接受农耕文化，并使之相互融合。人们津津乐道的盛唐文化，就是这种融合的代表性产物。同时，崛起于“大漠板块”上的各种政权也经常是农耕文化的继承者，乃至于代言人，如北朝及隋唐、辽朝、元朝等。

就“泛中原板块”而言，在秦汉及其以前，该板块曾利用其先发优势，对其他“文明板块”起到过主导作用。同时，五大“文明板块”最终被统合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粘合剂——“大一统”思想、“华夷同源”谱系、“天下观”等理论发祥于此。另外，各“文明板块”入主中原后共通的交流工具——汉字也在这里产生。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三国时代以降，由于生活手段与生产方式的局限，从“泛中原板块”上孕育出来且由汉族为核心集团成员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往往善文治而乏武功，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不是表演者本身，而“泛中原板块”所能做的则经常是提供一个表演舞台而已。“泛中原板块”最终未能武功上担负起统合中国疆域的历史使命。

位于东北亚核心区域的“辽东板块”，在前近代，她既有着“大漠板块”大致相同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有着游牧铁骑同样的南下冲动，但更兼有游牧生产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之长。唯其如此，康熙帝、雍正帝与乾隆帝祖孙三代最终实现了将“天下归于一统”的长久理念。这个理念自战国时代生成、前汉业已成熟，但在康雍乾三帝之前，始终没有人能够将其变成现实。

“雪域板块”介于印度、中亚与中原文明之间。但令人感兴趣的是，“雪域板块”为什么最终能够成为中国疆域的有机构成部分。究其要者，人文地理条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的青藏高原，唯其东北部低缓，并且有若干个山口与“泛中原板块”相连。这些山口既是吐蕃人祖先移住青藏高原的通道，也是其欲回归故土、回归母文化的回路。自吐蕃民族共同体形成之时，吐蕃人就有着与生俱来的东向发展与东向拓展的潜在冲动。恰恰是这种东向发展的态势，以及相对便利的地理环境，为元朝开拓青藏高原提供了切实的机会与条件。

从西汉到明初，以中国官府与私人社会力量为核心，辅之以东亚其他力量，曾主导着“海上板块”贸易近2000年之久。明初至清中后期，一支反抗母国禁海政策的中国私人海上力量先被母国水军追杀，后来明清朝廷水军又与西方殖民者前追后杀，朝廷与西方殖民者均欲灭之而后快。但这支海上私人力量前仆后继，在该海域贸易体系中仍维持着主导地位，并为明清乃至民国货币本位的实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通过“海上板块”大量吸收日本、美洲白银的直接后果，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这些迅速增长的人口携带着从“海上板块”传来、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红薯与马铃薯等高产、耐旱、耐寒、耐瘠土的作物种子向东北、北部、西北与西南等高寒、高纬度地带移民，使得这些地域与中原地带迅速均质化。同时，官府则凭借着从西方传来的火器开始征服西南等地抗命土司、讨平以游牧铁骑

著称的青海蒙古和硕部与西北蒙古准噶尔部。另一方面，因大海之子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年统一台湾而使中国今日仍拥有巨大海域。凡此种种，莫不表明“海上板块”对中国社会进程，特别是疆域变更的影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古代数大文明发祥地大都形成过世界帝国。但除了黄河流域文明之外，今日所有主导旧帝国废墟的人们，都不是旧帝国原文明衣钵的嫡派传人。那么为什么单单中国例外呢？这似乎应该从统合中国疆域的意识形态中寻求答案。

无论是“大一统”思想，还是“天下观”、“华夷同源”谱系，实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大一统”而言，该思想原本是晦涩难懂的哲学命题，但通过历代有识者的努力，他们把难懂的、学术性的、而且常常是朦胧混乱的哲学转变为明白易懂的语言，最终简化为标语口号。所以，虽然在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领土观。伴随着这个“大一统”思想逐渐衍变成历代帝国的意识形态，历代有作为的最高统治者也获得了统一天下的思想武器。自秦汉以降，历代世界级帝国开创者心中的疆域模式始终是统一的帝国，尽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统一的帝国”是想像的或理念之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作如是观。这也意味着，在近两千年时间里，要重新创建和重新形成帝国体制，总是有现成的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资源可以利用。中国各个时期的较强大的王朝，如唐、元、清等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能力，确实依赖于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论理。否则，如果国家只是力求用军事手段延长自己的统治寿命的话，就会在强制性资源和控制手段方面引起难以收拾的问题，从而造成国家的瓦解。因为唐、元、清即使在全盛期，相对于其1300多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陆疆而言，其不足百万的军队，面对近代极端落后的交通条件与以人力畜力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唐、元、清时期的国家有能力根据各地的社会特点，改变策略和人员配备，以促进统合和控制。尽管如此，汉、唐、元、清四朝都能根据当时各地的社会特点，随时改变策略和人员配备，始终以微量的军力维护帝国的稳定与发展。这也是它们高举“大一统”思想旗帜、心存“天下观”理论、有效运用“华夷同源”谱系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其他几个从大河流域崛起的世界级帝国的核心力量都是中心地带兴起，而后向周边扩充。但该帝国一旦灭亡，支撑着帝国的核心力量便也随之冰消瓦解。而古代中国的世界级帝国均形成于狭义中原的边缘或泛中原板块的边缘，他们为中国链条式世界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前仆后继的能量。

## 注 释：

①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初步统一中原，为后来的汉帝国崛起准备了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中经汉高祖、惠、文、景帝的经营，汉帝国渐次崛起；自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33年汉元帝驾崩，汉帝国趋于鼎盛；自公元前32年汉成帝即位，到公元220年曹丕建立曹魏政权，直至316年西晋政权灭亡，期间汉帝国由衰败而中兴，但也没有挽救其命运。三国西晋虽从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乃至主体统治族群上，继承汉帝国而来，但没有一个政权能够挽救颓萎不堪局面，从而摆脱短时期便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②自317年以降的“五胡乱华”，随之而来的东晋十六国，及其后来南北朝、隋唐时代，莫不是唐帝国崛起的前奏。各种政权与势力经过三百年的彼此攻伐，各种族群经过三百年的相互融合，一个崭新的“外汉内胡”帝国——唐帝国伴随着李世民的登场而趋于强盛，中经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的经营，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达到了鼎盛。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帝国进入衰退渠道，渐次衍化成“五代十国”局面，最终无法收拾。

③契丹人与蒙古人同属游牧民族且血缘甚近。916年，契丹人兴起蒙古草原东南部，尔后向

四周拓展。中经契丹-辽帝国对蒙古高原、今东北、京津，及冀、晋北部的经营，再经金帝国在此基础上向南推进，长时期对黄淮海流域的开拓，凡此种种，均为蒙古-元帝国的横空出世铺垫。自1206年成吉思汗兴起于斡难河畔，到朱元璋政权占领北京，此时期为蒙古-元帝国的鼎盛期。自1368年元顺帝退狩蒙古草原开始，元帝国走向衰落。到1632年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元帝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④就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而言，清帝国文明有三个源头，分别为满洲人与生俱来的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明王朝废墟上的农耕文明与政治制度、北元王朝-鞑靼汗朝废墟上的游牧文明与对草原统治的合法性。清帝国经过清太祖、清太宗、清世祖的经营，到了康雍乾三朝，达到了繁盛，形成了世界帝国的模样。嘉道以降，清帝国缓慢地走向衰落之路，迨至1840年清英之役，再也无法恢复其元气，从此走上不归路。

⑤清朝第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由穆彰阿等主持，历时34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因这次重修始于嘉庆十六年，所辑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断，故名《嘉庆重修一统志》。

⑥该“板块”只是借用板块构造论（plate tectonics）的名词，表明各个不同地域的动感的、立体的形态。

⑦[日]后藤十三雄著、布林译：《蒙古游牧社会》，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研究会1992年编印，第24~28页。根据甘肃农业大学编《草原调查与规划》（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一只带羔母羊为一个羊单位，一匹成年马与牛相当于5个羊单位。

## 参考文献：

- [1] 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
- [2] 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
- [3]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陈梧桐：《论中国的历史疆域与古代民族战争》，《求是学刊》1982年第4期；陈玉屏：  
《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 [4] 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
- [5] 杨建新：《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第1期；  
周伟洲：《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 [6]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 [7] 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历史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 [8] 徐旭生：《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
- [9]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收入《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 [10] 蒙文通：《古史甄微》，收入《蒙文通文集》第五卷，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版。
- [1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38页。
- [1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4页。
- [13]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1《高祖纪》、卷2《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

- [14]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1《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
- [15]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 [16]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8~189页。
- [17]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36《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45页。
- [1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 [19] [俄]迈斯基著、汉昭译：《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载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编辑刊印：《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集，第215~216页。
- [20]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 [21] 姚薇元：《唐蕃会盟碑跋》，《燕京学报》第15期。
- [22]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内容提要”。
- [23] [美]皮德罗·卡拉斯科 (Pedro Carrasco) 著、陈永国译：《西藏的土地与政体》(Land and polity in Tibe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59年), 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1985年版，第235页。
- [24]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中文版前言”。
- [25] [日]松浦章著：《清代的海洋圈与移民》，收入《来自于周缘的历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
- [26]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等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 [27]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魏黄初二年三月”条，“臣光曰”，《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影印宋刻本。
- [28] [日]渡边信一郎著：《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东京：校仓书房2003年版，第40~60页。
- [29] [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 [30]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 [31]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15《唐纪》“天宝元年一月”条，《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影印宋刻本。
- [32] 于逢春：《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 【论 文】

### 一九四二：继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谎言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一）

熊芳亮

1942年8月，正值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危难时刻，蒋介石在青海省西宁市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国族一宗族”论，并于次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蒋介石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汉、满、蒙、回、藏”的“总名称”，并将“汉、满、蒙、回、

藏”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单位”，且“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蒋介石宣称，

“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sup>1</sup>。

长期以来，“国族—宗族”论已经被视为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历史标签，成为论证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理论“反动性”的政治标本，但其形成过程和思想渊源却至今成迷。

一种观点认为，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思想基础。学界或将“国族—宗族论”视为蒋介石“承袭”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的产物，认为“国族—宗族”论是蒋介石“依据国父遗训——‘家族—宗族—国族’模式对中华民族作出解释”<sup>2</sup>；或认为“国族—宗族论”是蒋介石在孙中山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衍化”和“发挥”，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认识“既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民族平等、团结、五族共和等认识，同时在实践中受到国内外政治思潮与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将孙中山的国族理论及民族同化思维进一步发挥，宣传中华民族一体观，进而衍化出宗族理论”<sup>3</sup>。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为“国族—宗族”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sup>4</sup>。而马戎也推断，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观点，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很可能也有一定影响”<sup>5</sup>。

就第一个观点而言，其始作俑者正是蒋介石本人。蒋介石一再声称“国族—宗族”论沿袭了孙中山先生“先有家族，再有宗族，再有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sup>6</sup>。然而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第一，就理论体系而言，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构建在伪篡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戴季陶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之上。**自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之后，孙中山的三个“主义”一直就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

<sup>1</sup>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的共同的的责任——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在西安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户、千户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九），（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16—218页。

<sup>2</sup>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4页。

<sup>3</sup> 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sup>4</sup>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于《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sup>5</sup> 马戎：《“民族”之辩——从1939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一）》，中国民族报，2012年11月2日，第07版。

<sup>6</sup> 蒋介石：《三民主义的本质——伦理、民主、科学》（1952年7月7日在青年夏令讲习会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74页。

奋斗”，对内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对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为国家争自由”<sup>1</sup>；就民权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实现“政权”（人民之权）与“治权”（政府之权）的分离，分别设立“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和“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检察权），实现“人民政治地位”之“平等”；就民生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四万万人民谋幸福”。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就是“自由”，民权主义就是“平等”，民生主义就是“博爱”<sup>2</sup>，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sup>3</sup>，三者内容上不可或缺、在程序上相辅相成。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而派系斗争最常见的方式，除了军事上的兵戎相见，权力上的相互争夺，政治上的相互倾轧，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同样白热化——争夺的核心和焦点，就是看谁是继承和代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的“正统”。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sup>4</sup>连续撰写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及《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鼓吹“纯正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一套反共理论体系，得到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广泛认同，史称“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迎合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反苏立场，不仅实现了中国国民党右派的组织联合，为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成为蒋介石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变成“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sup>5</sup>。蒋介石对“戴季陶主义”推崇备至，将之视为奉行三民主义的圭臬，认为“凡是亲承总理教训的人”，“都承认”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能真实表达总理思想学说的全部精义”<sup>6</sup>。宣称继承孙中山先生政治遗志和思想衣钵的蒋介石，在伪篡、捏造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道路上走得比戴季陶更远、更彻底。蒋介石进一步发挥戴季陶把“三民主义”划分为“能作”、“所作”两部分的思想，以“知”、“行”学说统领“三民主义”，将孙中山“三民主义”视为纯粹的“原理”和“理论”，另起炉灶专门炮制了一套“三民主义实行程序”，为其继续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宣扬并推行其政治主张、施行专制统治奠定了思想前提。戴季陶“纯正三民主义”的政治重心以“民生”为首要，认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一个主义”——民生主义，“民族”和“民权”不过是实现于“民生主义”所必经的过程和阶段，而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的实现又以民族精神的恢复为基础，实际上将“三民主义”构建在“精神”和“意志”的基础之上。蒋介石政治思想的重心则将“建国”列为三民主义的首要政治任务，将三民主义分解为“五个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三个方面（教育、军事、经济），服务、服从于其“建国”的政治目标，完全背弃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原意和初衷。

<sup>1</sup>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2页。

<sup>2</sup>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3页。

<sup>3</sup>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1924年8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4页。

<sup>4</sup> 戴季陶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一方面，他长期跟随孙中山，与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他又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和领导者交往甚密，甚至一度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起草建党文件，最终因为排斥“阶级斗争学说”并遭到孙中山的反对而退出。戴季陶对孙中山的思想脉络一清二楚，对马克思主义亦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顽固的反共态度，曾让鲍罗廷将之视为威胁中国共产党的“五毒”之一。

<sup>5</sup>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sup>6</sup>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转载于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

第二，就目标对象而言，蒋介石“国族-宗族”论完全颠覆了孙中山新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而是服务、附属于独裁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是“对外”的，其目的一要恢复地位，即“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地位，解除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人民的压榨压迫；二要实现团结，即“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三要扶持弱小民族，使其能“自决自治”。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用的”<sup>1</sup>，“就是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sup>2</sup>，“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sup>3</sup>。而在蒋介石的政治理论框架之中，“民族主义”是“对内”的，其首要任务被蒋介石转换为“恢复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提出“要御外侮，救中国，根本的问题，第一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性”<sup>4</sup>，“有了国魂，才可以抵御外侮，完成革命”<sup>5</sup>；而要恢复“民族精神”、“民族性”，实现“中国的国家民族复兴”，“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sup>6</sup>。蒋介石以恢复民族性、民族精神为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前提；恢复民族性、民族精神，又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sup>7</sup>为基础；恢复“民族道德”，又以“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为实行<sup>8</sup>，通过一系列概念转换和逻辑推理，以所谓的“心理建设”、“伦理建设”<sup>9</sup>取代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为目的的“新民族主义”，最终将反帝、平等、民主的“民族主义”完全“伦理化”，成为服从、服务于蒋介石推行“奴化教育”、进行思想钳制、施行独裁专制的统治工具和政治借口。

第三，就基本概念而言，蒋介石的“国族-宗族”论蓄意歪曲了孙中山的“国族”、“宗族”概念。蒋介石的“国族-宗族”论由两个论点组成：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国族”论；其次就是将汉、满、蒙、回、藏各族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单位”并称之为“宗族”

<sup>1</sup>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

<sup>2</sup>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

<sup>3</sup>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31页。

<sup>4</sup>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页。

<sup>5</sup>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7页。

<sup>6</sup>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页。

<sup>7</sup> 所谓“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被蒋介石视为“民族德性的结晶”。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sup>8</sup> 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核心，就是“一切方略程序，总理已经为我们详细的订定了，我们只须按照方略，依着实行，各就行性学识之所宜，确定计划步骤，本平良知良能，竭尽我们救国救民的本职，勇往积极的去做，就必然能达到目的”，“因为我们都是后知后觉，我们除了基本的革命大义以外所知的实在是有限，因此我们一方面固然应当竭力求知，同时还应该从力行中去求真知，凡是我学问经验中认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如果不是经过实行而真名为有效，就不能断定所知者果为真知。所以我们一切的事业，必须实行而后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而后能知”。蒋介石：《行的道理（行的哲学）》（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44页。

<sup>9</sup> 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化解为五个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参见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实程序》。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的“宗族论”。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所使用的“国族”概念，以承认各族之间在“血统”、“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sup>1</sup>，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为前提，完成了从基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再到基于全体国民基础之上的“民族（国族）”概念的转变<sup>2</sup>。而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戴季陶认为，“民族是以文化为基础，是在同一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面构成的”<sup>3</sup>；“中国民族是以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民说是有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sup>4</sup>。蒋介石显然深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强调“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融合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宣称中国历史“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合四邻的宗族”，使其“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中华民族各单位”“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sup>5</sup>——其“国族”概念以血缘、文化为基础而不是以“全体国民”为基础。其次，孙中山所使用的“宗族”概念，只是孙中山借助以实现“国族团结”的社会“旧团体”之一种。在《孙中山全集》中，孙中山无一处称少数民族为“宗族”，更无一处使用具备“民族”或相关意义上的“宗族”概念。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系列讲座中强调，要实现民族主义就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发挥传统组织的作用。在孙中山看来，要结成大团体，便要有小基础，这样联合起来，才容易成功。而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和家乡基础，“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便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sup>6</sup>。孙中山在阐述“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的同时，提出“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得多”<sup>7</sup>，充分表明“宗族”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社会团体”，与蒋介石所用以替代基于血缘、文

<sup>1</sup>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188页。

<sup>2</sup> 参见熊芳亮：《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四）》，《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2012年8月3日。

<sup>3</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8—139页。

<sup>4</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7页。

<sup>5</sup>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年）。

<sup>6</sup>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页。

<sup>7</sup>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

化、语言、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蒋介石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先有家族，再有宗族，再有民族”的理论概括，显然是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刻意歪曲。

以上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的“新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颠覆性的篡改与体系性的歪曲，所谓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炮制“国族-宗族”论的观点，不过是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编造的一个政治谎言。

## 【论 文】

# 一九四二：蒋介石炮制“国族-宗族”论的政治动机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二）

熊芳亮

蒋介石之所以炮制“国族-宗族”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其原本所坚持的“放任”、“分治”的民族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臭名昭彰。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窃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于1928年12月实现了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在如何认识、理解和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遗产，尤其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民族主义”路线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西山会议派”极力否定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民族自决”主张，称“如是自决，则满族自决，而东三省亡于日；藏族自决，而西藏亡于英”，强调要坚持“孙先生手著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所规定的民族主义，而非国民党一大宣言所规定的民族主义，主张在“汉、满、蒙、回、藏人民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族融合”<sup>1</sup>。而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戴季陶，则主张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允许蒙藏“独立”。戴季陶将中国的民族问题划分为“小问题”和“大问题”两个部分。所谓“小问题”，是指“苗，瑶，罗罗”等“散在国内的很小数的民族”而言，戴季陶主张“完全以政治力在平等的条件上面统治他们感化他们”，也就是“厉行同化”。所谓“大问题”，是指蒙古，西藏问题，戴季陶主张“以尊重独立为原则，以平等的自由的联合为原则”<sup>2</sup>，提出“要承认蒙古独立”，“要尊重(西)藏的独立，尊重西藏的自由”<sup>3</sup>，完全置孙中山所宣示和追求的“国家统一”、“民族统一”、“行政统一”于不顾。

---

1986年版，第239页。

<sup>1</sup>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481页。

<sup>2</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2—143页。

<sup>3</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3—144页。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领袖”和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抗战之前虽不敢公然宣扬“分裂”、“分治”，但其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放任主义”态度，足以证明其深受戴季陶的影响。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就外交、边疆问题发表演讲，其时东北沦入敌手，华北岌岌可危，内蒙眼见不保，蒋介石竟然出奇的淡定，不仅将国土沦丧的政治责任推卸给“实力不济”，将“边疆离析”轻描淡写地称为“体面”问题<sup>1</sup>，提出对“边疆问题”采取“放任”政策，并强调“在今日情势之下，虽欲不放任，事实上也只能放任”<sup>2</sup>，打着“师苏俄‘联邦自由’之意，依五族共和之精神标明‘五族联邦’之政策”的幌子，宣称“五族联邦”乃今日应付边疆之惟一有效途径<sup>3</sup>，幻想着“一旦国际大变发生，即可乘机奋起，统一复兴，时不在远”，试图引导国民党接受“除本部应为整个的一体以外，边疆皆可许其自治而组织五族联邦之国家”<sup>4</sup>的主张。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放任”、“分治”的“民族主义”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激烈反抗，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困境。

第一个方面，来自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最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操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和利用分离主义运动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一是煽动、挑唆各民族之间、蒙藏政教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激化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二是以支持“独立建国”为诱饵，诱因中国民族分离势力投向日本怀抱；三是打着“民族协和”的旗号操纵、控制从中国“分离”、“独立”后的伪政权；四是逐步倡导“日满蒙融合”，大肆推行奴化和同化教育，以图最终实现对“满蒙地区”和中国全境的完全吞并。

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日本很快便将这套理论体系和政治纲领应用到内蒙王公贵族身上，利用内蒙王公贵族推动的“高度自治运动”和蒙汉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先后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扶持建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sup>5</sup>、伪“晋北自治政府”<sup>6</sup>、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sup>7</sup>，并于1939年8月将上述3个伪自治政府合并成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继“满蒙”之后，日本以同样的伎俩，以迎合分裂势力的“独立”诉求为诱饵，以“民族主义”学说为旗号，将触角伸及中国西北回族聚居区<sup>8</sup>。蒋介石“分裂”、“放任”的“民族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旨在分化中国、灭亡中国的既定战略之下，早已产生远远超出蒋介石所能操控的政治后果，直接危及到国民党统治

<sup>1</sup> 蒋介石：《东亚大势与中国复兴之道》（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98—99页。

<sup>2</sup> 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193—195页。

<sup>3</sup>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05—109页。

<sup>4</sup>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05—109页。

<sup>5</sup> 1937年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日，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以张家口为“首府”，管辖察哈尔南部10个县，人口约200万。伪“察南自治政府”于1939年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1943年改为伪“宣化省”。

<sup>6</sup> 1937年9月13日，日军侵占大同，10月15日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驻大同县，统辖雁北13县，150万人口。1939年“晋北自治政府”改为伪“晋北政厅”，隶属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3年又改为伪“大同省公署”，隶属伪“蒙古自治邦政府”。

<sup>7</sup> 1937年10月27日，内蒙古王公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宣布蒙古“自治”，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sup>8</sup> 有关日本操弄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侵华战争的历史，笔者还将另外专文论述。

的核心区域和蒋介石集团统治地位的稳固。

第二个方面，来自于国民党外的舆论压力。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各民族“团结一体、共同抗日”的基本方针，提出“在目前阶段上，中国一切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前面都发生亡国的危险，一切民族应当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最亲密的团结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应当彼此帮助，以加强抵抗侵略者的力量”<sup>1</sup>，对蒋介石集团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揭露和全面批判<sup>2</sup>。社会有识之士也对蒋介石集团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路线强烈不满。1934年，顾颉刚在参与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巡视”之后，深感国民党政府“边疆政策”的失败与无能，指责国民党“继续清季的边疆政策，中央派去的安抚大员都是大事搜刮，地方官吏也是横暴之极”<sup>3</sup>，“对于边疆确实没有根本的政策和一贯的工作，只有敷衍的空话”<sup>4</sup>，“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sup>5</sup>。顾颉刚的指责可谓一针见血：“边疆人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着他们（德王）倒过去，岂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进攻”<sup>6</sup>。顾颉刚指斥戴季陶在边疆地区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批评国民党试图“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化”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削足适履”的“笨事”<sup>7</sup>。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其《中国民族演进史》中，明确表示“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强调“现今世界上，决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中国自然也是如此”，“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sup>8</sup>。在蒋介石集团的专制统治之下，发表这样的言论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勇气。1939年，顾颉刚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文章，引起学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虽然学者的观点不一，但是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统一、主权统一的根本性问题上，却有广泛的共识。

第三个方面，在上述背景之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权力斗争更趋激化。在“放任主义”

<sup>1</sup> 《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1989年版，第71页。

<sup>2</sup> 笔者将另文专述。

<sup>3</sup> 顾颉刚：《我的事业苦闷》（1948年1月22日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演讲稿）。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4页。

<sup>4</sup>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5页。

<sup>5</sup>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5页。

<sup>6</sup>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5页。

<sup>7</sup> 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1937年11月10—14日甘肃《民国日报》）。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1页。

<sup>8</sup>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1934）。载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的指导思想的之下，蒋介石一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不抵抗”政策，“放任”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了东北三省；二在“东陵劫案”中徇私枉法并拒绝与清皇室谈判，“放任”末代皇帝溥仪投靠日本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sup>1</sup>；三在内蒙古地区强行推行省治激化内蒙自治运动而后敷衍塞责，“放任”内蒙王公投靠日本建立“伪蒙政权”；四在北京接受日本所谓的“非军事化”的无理要求，“放任”“华北自治”……蒋介石甚至公然指责内蒙王公抵制南京国民政府以“商租权”与日本交换东北主权的“条件”，指责张学良抵制其放弃“北满”地区“默许”苏联势力“南进”以挑起日苏对抗的“妙计”<sup>2</sup>。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步步退让、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之下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难境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先分裂再收复”的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路线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和激烈反抗。1935年，傅斯年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口号，强调“中华民族是整个”“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反对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所操弄的“华北自治运动”中所采取的“裂土自保”的绥靖政策<sup>3</sup>。张学良和杨虎城甚至不惜发动“西安事变”以军事手段逼迫蒋介石采取抗日立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觉意识空前增强，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大背景之下，国民党内部主张“国家统一”的“融合论”逐渐占据了上风。

在此背景之下，调整原有的“民族主义”中的“分治”、“分裂”主张，已经成为蒋介石维护其“抗战领袖”的政治形象、巩固其独裁专制统治的迫切需要。

## 【论 文】

同一个观点，竟被认为对国共两党的民族理论政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间是  
否存在悖谬或误解之处？

---

<sup>1</sup>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坦言东陵劫案对其“宗族感情的伤害”甚至“超过了自己被驱逐出宫”，“在宗室和遗老间引起的激愤也是普遍而高昂的”，蒋介石随后的徇私枉法更使他“复辟、复仇的思想”也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相关事件的学术研究还可参看[美]路康乐著：《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329页。

<sup>2</sup>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05—109页。

<sup>3</sup>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15日。林文光选编：《傅斯年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 一九四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误会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三）

熊芳亮

1939年2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警示“民族自决”之类的口号、“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中国内部的“民族”划分所带给中国的现实危害，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文化集团”来替代“民族”的划分，并呼吁“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sup>1</sup>。顾颉刚的文章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激烈争论，傅斯年<sup>2</sup>、吴文藻、白寿彝、费孝通<sup>3</sup>、翦伯赞<sup>4</sup>等诸名家参与其中，并最终延伸为国共两党在民族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交锋。也正因如此，这场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隐而不彰”，“不但这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事后都较少提及，甚至相关文章也基本没有收入个人文集”<sup>5</sup>。直至近年来，学界才对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大讨论，进行了比较细致、周密的史料挖掘和理论分析<sup>6</sup>。这种关注一方面自然要归功于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等相关重要当事人的“全集”或“文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公开出版，使长期淹没于世的学术文献重新公诸于世。另一方面，也有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学界关于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进行的重新思考和“再反思”争论的因由，以古为鉴、借古喻今的意味显而易见。也正因为如此，正确、真实地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有学者认为，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为蒋介石的“国族一宗族”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

<sup>1</sup>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第9期。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4—106页。

<sup>2</sup> 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sup>3</sup>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1日，第19期。

<sup>4</sup>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六卷第1期，1940年4月。

<sup>5</sup>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sup>6</sup> 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忆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第07版。张雷：《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马戎：《“民族”之辩——从1939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1—4），《中国民族报》，20012年11月2日、9日、16日、23日。

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sup>1</sup>。而马戎则推断，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观点，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很可能也有一定影响”<sup>2</sup>。而笔者则认为，这只是后人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国族-宗族”论二者关联性认识上的一种“误会”。

第一，就“国族”论来看，“国族-宗族”论选择性地借鉴了“同源说”和“融合说”两种观点以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统一性。为了调适“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史学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是民国学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一个重要理论路径——其中又可以分为“融合说”和“同源说”。“融合说”认为，“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等各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血缘融合”而成，持此观点主要有王桐龄、林惠祥、陶希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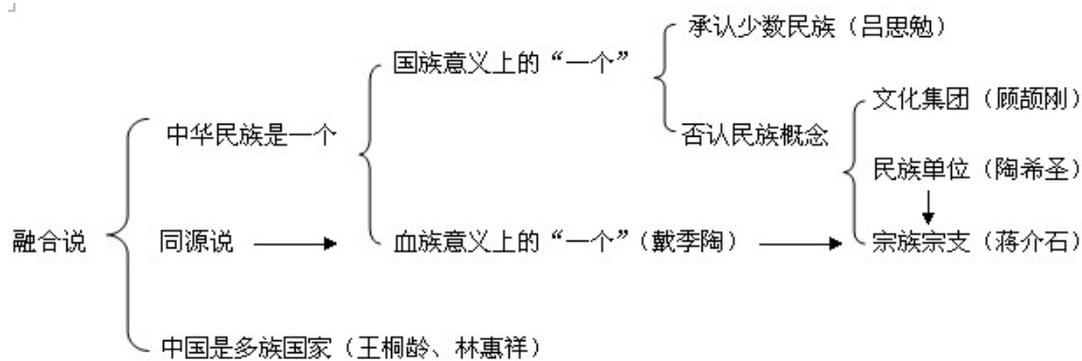


图 1：“国族-宗族论”与学界关于“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谱系

顾颉刚等人。1928年，王桐龄在其《中国民族史》（1928）中提出，“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中华民国”“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亦绝无单纯血统”<sup>3</sup>。1929年，陶希圣在其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中，提出“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言语、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sup>4</sup>。1937年，顾颉刚提出中国各族是“经过了几千年互相混合同化的结果”，“国内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无所谓汉族等等勉强分别的族名”<sup>5</sup>。1939年，林惠祥在其所著的《中国民族史》（1939）中提出，“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其他各族亦皆有别系之成分”

<sup>1</sup>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于《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sup>2</sup> 马戎：《“民族”之辩——从1939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一）》，中国民族报，2012年11月2日，第07版。

<sup>3</sup>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序》（1928）。王桐龄：《中国民族史》（1928/1934），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sup>4</sup>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1页。

<sup>5</sup> 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民国日报》（甘肃），1937年11月10—

1。“同源说”则认为，汉、满、蒙、回、藏各族自古以来就是“系出一宗，族同一祖”，同祖同源。持此观点的主要是戴季陶。1930年，戴季陶在为马鹤天所著之《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书写的序中，提出“汉族之与蒙古民族，系出一宗，族同一祖，但视其面貌骨骼，便已足自信不疑，则两族之当亲睦协和共图其存在发展不待更述而自明矣”，且认为“蒙回俱族，其理亦同”<sup>2</sup>。无论是持“融合说”还是“同源说”，王桐龄、林惠祥、陶希圣、戴季陶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民族”与“血缘”相关，并且有着共同的理论目的，也就是试图论证和构建以“血缘”为基础的“国族”——“中华民族”概念。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关于“中华民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为同源），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即为融合）”的表述，显然同时借鉴和采纳了“融合说”和“同源说”这两种观点。同时，《中国之命运》也没有放弃戴季陶所主张的“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仍然坚持称“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就是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礼义廉耻”这“八德”和“四维”<sup>3</sup>。

但是，蒋介石对学者意见的借鉴和采纳，完全取决于学者的观点和结论是否迎合或符合其建构和调整“民族主义”的理论需要和政治动机，而不是在学者的观点和结论的基础之上建构和调整其“民族主义”理论。在“国族”与“民族”概念的关系问题上，陶希圣、戴季陶、顾颉刚都将“国族”等同于“民族”，但陶希圣、戴季陶是以“血缘”为基础论证和构建“国族”/“中华民族”，唯有顾颉刚所使用的“国族”概念最契合孙中山基于全体国民基础之上“国族”概念<sup>4</sup>，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sup>5</sup>，强调“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sup>6</sup>。1935年，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也曾提出“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两者“不容混淆”的观点，认为“现今世界上，决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没有以一民族而组织一国家的”，“一国家中，总包含好几个民族”，“中国自然也是如此”<sup>7</sup>，堪称睿见。但蒋介石恰恰试图在血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构建“中华民族”。由此可见，真正影响、主导“国族-宗族”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的，是戴季陶、陶希圣等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顾颉刚或其他学者的意见。

第二，就“宗族”论来看，其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来源于蒋介石集团御用理论家的理论创造。

---

14日。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2页。

<sup>1</sup>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0页。

<sup>2</sup> 戴季陶在序言中还说：中国建国之基本，为汉民族之文化，故今后汉民族应努力以其文化化蒙古民族；而蒙古民族应努力接受汉民族之文化，复于上古同族同宗之本原，而造成真正统一之中华民国……。载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

<sup>3</sup>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一章。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7页。

<sup>4</sup>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参见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

<sup>5</sup>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年2月13日。载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4—106页。

<sup>6</sup>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6页。

<sup>7</sup>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1934）。载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关于《中国之命运》作者，史学界尚有诸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命运》是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替蒋介石“捉刀”完成的作品；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为《中国之命运》也是倾尽心力，因此该书完全体现的是蒋介石的思想和主张。但无论是哪个观点，都没有排除陶希圣等“御用理论家”在《中国之命运》写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宗族”论这一部分而言，陶希圣显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30年，陶希圣在其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就曾以“民族的单位”称谓少数民族，他写道：

从中国的政治的领域里面做一番粗略的搜查，我们已经看见了许多的民族的单

位 ( Ethic Units )，如甘新的回民，川滇的苗瑶，外藩的蒙藏<sup>1</sup>。

而“国族—宗族”论中最关键的观点，即将汉、满、蒙、回、藏各族称为“宗族”，同样与陶希圣存在密切关联：虽然陶希圣并不认同“同源论”，但却有将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视为“宗族”的“前科”。陶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提出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习惯以“宗族意识”隐蔽“民族意识”，而北方“异族”在迁徙、征战中原的时候沿袭了这一做法，同样以“宗族传说”隐蔽“民族”差异。陶希圣论述道：

春秋以前，……当时有种族意识，却为宗族意识所点染。……春秋期间，种族

意识已经发生和发达。种族意识受宗族意识的点染。种族以内又杂有宗族意识，很

强烈的存在于其间<sup>2</sup>。

……

( 汉代以后 ) 中国的民族融合……比秦代以前更进一步。西域、南越、西南夷的

发见和匈奴的战争，至少使士大夫阶级乃至商人阶级发生民族差别的认识。但是，

士大夫阶级却仍尊重宗族的传说，时以宗族意识隐蔽了民族意识<sup>3</sup>。

陶希圣进一步论述道：“在这种态度之下，北方诸异族，如匈奴、鲜卑等等，依其向中原的迁徙和战斗，各持其宗族的传说，加入了民族融合的过程”<sup>4</sup>。在如何认识汉、满、蒙、回、藏等各族的现实存在的问题上，陶希圣将汉、满、蒙、回、藏等族视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单位 ( Ethnic Unit ) ”<sup>5</sup>，而顾颉刚则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三大“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

<sup>1</sup>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6页。

<sup>2</sup>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5—96页。

<sup>3</sup>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2页。

<sup>4</sup>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2页。

<sup>5</sup>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6页。

团”替代各族的名称<sup>1</sup>。蒋介石显然采纳和借鉴了陶希圣的观点。对蒋介石这样的政治家而言，给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所确定的替代名称，“科学性”显然并不是第一条件，各族群众的“意愿”显然更不是参考的重点，能否为其巩固统治地位“所用”、能否为各派政治力量“接受”才是首要考虑的内容。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推出“国族—宗族论”，在政治上显然是最佳选择：既看起来满足了国民党内要求推行“国族融合”政策的呼声，又顺应了社会各界呼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舆论，而且还能强化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政治继承者的形象。虽然“国族—宗族”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先有家族，再有宗族，再有国族”的断章取义和刻意歪曲，但这对于蒋介石集团而言本来就轻车熟路——无论是戴季陶“纯正的三民主义”还是蒋介石“三民主义实程序”，无不是以歪曲、曲解、解构、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蒋介石，才是“国族—宗族论”真正的“推动者”和“创造者”；也只有蒋介石才有资格和胆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宗族”论是继承孙中山的“遗训”。

第三，蒋介石所倡导的“国族—宗族论”，不过是为维护其“抗战领袖”、“民族英雄”的声望和假象，满足其巩固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专制统治的需要而精心编造的政治谎言和理论骗局。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虽然主张“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但其“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和“分治”、“分裂”的“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并没有丝毫改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终于一雪近代以降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历史，以巨大牺牲和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国际而言，中国已经跻身世界五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国际环境绝无仅有；就国力而言，经受住了长期战争考验的中国在民族凝聚力、军事组织力、政治动员力早胜抗战初期，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能力更加强大；就民意而言，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早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和共同意志。然而，蒋介石竟然在此大好背景之下出人意料地重新回到了“民族分治”的立场。

8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了实施“民族主义”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凡对于他持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必须予以精诚的扶持其成长，使之达成自主和独立的目的”；第二，“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具备自治能力，与有独立意志，而在经济政治上到达了可以独立程度之时，我们的国家对他们必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的扶助他们独立自由，永久视为中国平等的兄弟之邦”。第三，“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经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达成我们各宗族间精诚团结友爱互助之目的”<sup>2</sup>。蒋介石提出的“三个原则”，再次将外蒙和西藏划分在“国族”之外，提出要承认“外蒙独立”，扶持“西藏独立”，同时对他所称的“各省区

<sup>1</sup>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年2月13日。载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4—106页。

<sup>2</sup> 蒋介石：《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70—175页。

以内的大小民族”“厉行同化”。蒋介石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显露出其“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庐山真面目。在“分治主义”的民族主义指导之下，蒋介石不惜以牺牲外蒙主权的代价，换取苏联政府的所谓“三项政治承诺”，并于1946年初启动承认了外蒙“独立”的所谓“法理程序”。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在解释其为什么放弃“外蒙主权”时称，“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sup>1</sup>。1959年，在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之际，蒋介石在台湾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公然“许诺”将“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达赖集团关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地位”的“愿望”<sup>2</sup>。

由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历史的研究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显然没有改变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中“分裂”、“分治”的基本逻辑和专制、同化的政策取向，与蒋介石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在基本概念、理论方向、政治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和差异。认为学界为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或理论依据的看法显然是一种历史误解。与之相反的是，学界的研究动机和研究结论或是出于批判蒋介石集团在民族政治领域的倒行逆施；或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和焦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时隔七八十年，我们依然可以从顾颉刚对国民党“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化”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削足适履”的“笨事”；从吕思勉“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的批评之中，强烈感受到学者们理论良知和拳拳之心。虽然民国时期学者们试图以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回答和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的研究和结论是中国人民探索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将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体现。

## 【论 文】

蒋介石集团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显然绝非我们原以为的那般，只要简单地贴上“反动”的标签就会烟消云散，其背后所深藏的思想渊源与政治路径，更值得后人深思和警醒。

## 一九四二：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面相

---

<sup>1</sup> 蒋介石：《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致词》。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五），（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21页。

<sup>2</sup> 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1959年3月26日）。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三），（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22—223页。

熊芳亮

抗日战争期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蒋介石集团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迫对“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调整和调适，炮制“国族—宗族”论以缓解党内、党外和社会舆论的政治压力。这种理论调整和调适看似借鉴和采纳了学界的研究成果，顺应了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却并没有改变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自身固有的理论逻辑和政治路线。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一元化”的“民族”理论之下推行的同化、融合政策，以及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表示要承认外蒙、西藏“独立”的政治姿态，充分暴露了其“民族主义思想”中“分裂”、“分治”的政治本性。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以血缘、文化界定“民族”的边界，以“民族”去界定“民族国家”的边界的理论逻辑，“国族—宗族论”不仅无法缓解与“国家”之间的理论冲突，反而因为罔顾民意强加给各民族以“宗族”的名称，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现实矛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族—宗族论”并不能真实反映和完全代表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容和全貌。“厉行同化”的“融合”论只不过是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一个表象，“分治”、“分裂”与“同化”、“融合”的两面一体，才是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南京国民政府施政纲领的根本性特征。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文化化”的民族概念，“儒家化”的政治伦理，“军国化”的专制统治，“法西斯化”的“国家有机体学说”所共同孕育的一个历史怪胎。

以“文化”定义“民族”，以“民族”建构“国家”，是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最基本的理论逻辑。戴季陶认为，“民族是以文化为基础，是在同一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面构成的”<sup>1</sup>；“中国民族是以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民说是有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sup>2</sup>。“文化化的”民族概念，以及在文化、语言、地域、血缘的基础之上划分“民族”界限和“民族国家”界限的理论逻辑，既奠定了蒋介石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分裂、分治的“国家”观念，也奠定了蒋介石集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融合主义”的“民族”观念，使“融合”和“分治”这对看似矛盾、实则孪生的“民族主义”路线，在蒋介石身上得到了切实的体现。戴季陶清楚地知道“在中国现在疆域内是不止一族的，而其中最显著是二个……一是蒙古，二是西藏”<sup>3</sup>，但仍然宣称，除非做到文化上面的“一致结合”，“中国民族”的概念不适用于蒙古、西藏<sup>4</sup>，并且主张以基于文化、血缘意义上的“民族”来确定“国家的界限”。戴季陶主张，“要在民族的意义确定国家的意义”，“确定国家的界限”，

<sup>1</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8—139页。

<sup>2</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7页。

<sup>3</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7—138页。

<sup>4</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8—139页。

“建设起民族的国家”<sup>1</sup>，毫不掩饰地将蒙藏等少数民族划定为“异族”，蒙藏地区自然也就被划在戴季陶的“民族国家”“界限”之外，提出应当承认甚至帮助蒙藏实现“独立”<sup>2</sup>。戴季陶认为，“在一定地域，同一民族，为民族的独立存在和发展，由全体民众掌握政权，建造国家，由国家负担起为人民的共同生活来制造财产并求得财产分配的平等的责任，这才是三民主义的国家意义”<sup>3</sup>，毫无顾忌地寻求建立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的“民族国家”。戴季陶称，“我们讲救国……第一个要义是要在民族的意义确定国家的意义”<sup>4</sup>；“三民主义第一要点便是主张民族的国家，要以中华民族为本据，以建设起民族的国家”<sup>5</sup>，公然将外蒙、西藏甚至诸多少数民族地区抛却在“中国”之外！戴季陶“文化化”的“国族”概念和分治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儒家化”的政治伦理，以其“先亲后疏”、“先中心后边缘”、“先安内后攘外”的统治思想，奠定了蒋介石集团“本部一边疆”的“地域”观念和“国族—异族（蒋介石集团常常使用“边胞”、“边民”的概念指代少数民族）”的“人民”观念。戴季陶宣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sup>6</sup>，鼓吹“孙先生不是西方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家，是中国几千年正统思想的承继者”<sup>7</sup>，是“中国继往开来的圣哲”<sup>8</sup>。蒋介石同样宣称“三民主义”“其本质和基本精神之所在”完全是“历数千年一直传下来的”“历史文化的正统”<sup>9</sup>，是“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美德的遗传”<sup>10</sup>。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别、上下有别。蒋介石信奉“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的所谓“九经”，认为“九经”虽然“和现代的情形有多少不同的，但其条目虽可变通，而

<sup>1</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1—142页。

<sup>2</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

<sup>3</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56页。

<sup>4</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1—142页。

<sup>5</sup>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1—142页。

<sup>6</sup>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页。

<sup>7</sup> 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之哲学基础的演讲词——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在中国大学》。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sup>8</sup>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sup>9</sup> 蒋介石：《中国魂》（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63页。

<sup>10</sup> 蒋介石：《中国魂》（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61页。

原理还是一样”；“为政之道常在乎由内而外，使天下人从最亲近到最疏远的都能各得其所，来达到政治目的”<sup>1</sup>。蒋介石认为“从一个人的修身推到亲亲，再从亲亲而推到睦姻任恤，推到仁民爱物，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组织”“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特点”；“中国政治哲学将一个人由内发展到外，将一个人对于外在的关系，一步步的推广开去，是层次最分明，而步骤最确实的”<sup>2</sup>。在蒋介石看来，少数民族不过是儒家经典之中所谓的“远人”，不仅不是民族政治的参与主体，而是政治客体和统治对象，更遑论有平等的地位与平等的权利。在这种内外有别、亲疏有别、上下有别的儒家政治伦理的影响之下，蒋介石以汉族为“内”，以少数民族为“外”；以汉族为“亲”，以少数民族为“疏”；以中原内地为“本部”，以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为“边疆”，将蒙藏等“边疆地区”得失只是视为事关荣辱而无关大局的“体面”，而非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可以依据“实力原则”“收”、“弃”自如，将牺牲“边疆”主权引狼入室交换所谓的“政治利益”视为“平常之事”，将国家赖以生存的主权和人民按照地域划分为三六九等，以维护“核心”为政治根本，完全视人民意志和国家主权如掌中玩物。

“军国化”的专制统治，以实现和推行“一政专政”、“一人独裁”为目标，不承认自由、民主、权利的正当性，不承认民族成分、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在组织上强制要求国家政权、政党组织、普通国民实现军事化，成为蒋介石集团罔顾民情民意，强力推行“国族融合”和“分裂主义”的政治基础。无论是戴季陶还是蒋介石，都对日本军国主义推崇备至。按照戴季陶的理解，“军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的制度，“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sup>3</sup>。戴季陶认为，“建国的事业，必须有军政的组织”，“武力和战争，是建国最要紧的手段”<sup>4</sup>。在思想层面，蒋介石以将日本军国主义与“儒道”、“中国哲学”划上等号的方式，打着“恢复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的幌子，曲线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张目。蒋介石将日本的国力强盛归因于“中国的哲学”的成功，认为“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学的“就是中国的儒道”，尤其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sup>5</sup>；“（日本）武士道就是采取了我国一部分的固有道德，和一部分固有的军人精神”<sup>6</sup>，日本还只是“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

<sup>1</sup>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92—193页。

<sup>2</sup>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98页。

<sup>3</sup> 戴季陶：《日本论》（1928），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138页。

<sup>4</sup> 戴季陶：《日本论》（1928），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132页。

<sup>5</sup> 蒋介石：《自述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09页。

<sup>6</sup> 蒋介石：《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出席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21页。

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事情！”在制度层面，蒋介石则显得肆无忌惮，大力推行军国主义统治。1928年，蒋介石在北平发表演说宣讲南京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毫无掩饰地提出要在中国推行“军国主义”，宣称“军队是在是最讲究组织和纪律的”；“无论古今中外，要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和社会，都是要全国军队化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提出“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全国以内，无论任何物品都有统计，无论任何团体，都有严密的组织”<sup>2</sup>。蒋介石甚至直白告诫“不要听共产党的挑拨，说蒋介石提倡军国主义”；“须知这是真正救国的方法”<sup>3</sup>。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及其“实力化”的政治原则，使蒋介石集团可以漠视政治的正义性和反动性区别，无视人民的意志意愿和历史发展规律，将“边疆”和“异族”视为“国家”和“民族”的附庸和附属物<sup>4</sup>，随时可以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力量的强弱采取不同的施政方略，甚至可以用来交易和交换可能更为“核心”的政治利益。

德国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国家有机体学说，对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影响甚巨，蒋介石堪称是“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忠实拥趸。史学界大多将蒋介石1931年（民国二十年）在国民会议所作的开幕词作为其深受德国法西斯主义影响的标志。在该开幕词之中，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逐一进行批判。按照蒋介石的理解，“法西斯蒂<sup>5</sup>之政治理论本抽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有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sup>6</sup>。蒋介石评价说，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sup>7</sup>。蒋介石看似是要否定法西斯主义，实则只是批评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影响，对其制度层次却是崇羨不已。蒋介石认为，“国家这个东西，是一个有机体”；“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超

---

<sup>1</sup> 蒋介石：《自述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09页。

<sup>2</sup> 蒋介石：《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招待北平各界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222页。

<sup>3</sup> 蒋介石：《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招待北平各界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223页。

<sup>4</sup>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15日。林文光选编：《傅斯年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sup>5</sup> 即法西斯主义。

<sup>6</sup>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572页。

<sup>7</sup>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

于一切的集体组织”，“就是一个完密的生命全体”<sup>1</sup>。一方面，蒋介石利用“国家有机体学说”为其唯心史观和唯意志论提供思想依据。按照蒋介石的理解，国民是国家的“细胞”，国民党是国家“动脉”，三青团是国家的“新血液”，代表“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的“三民主义”就是国家的“灵魂”。蒋介石强调，国家就是因为“灵魂”，“所以成其为有生命的机体，而非死的无机物”<sup>2</sup>。另一方面，蒋介石利用“国家有机体学说”为其推行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支持。蒋介石认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经济，第三就是武力”<sup>3</sup>。所谓“教育”，“就是要养成‘军国民’的风尚”；“亦就是‘军国民教育’”<sup>4</sup>。所谓“经济”，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所谓“武力”，“包括国家所有的国民，人人应参加战事，致力国防，所有一切的物质，……皆为战争国防之需，莫不为武力之要件”；“就是要使全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成为军国民，即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能够为国牺牲的战斗员！”<sup>1</sup>蒋介石将三者概括为“教”、“卫”、“养”，并依此将“三民主义”解构为包括教育、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五种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在“儒家化”、“文化化”、“军国化”、“法西斯化”的“纯正三民主义”的左右之下，蒋介石最终形成了类似于日本“血族”主义的“国族”崇拜，既无法走出“国民党一大宣言”所提出的“民族自决”路线的陷阱，又无法真正理解和继承孙中山“国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虽然“融合”与“分裂”之间的理论分歧和政治冲突如此明显、如此强烈，但是在蒋介石集团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蒋介石不愿意接受“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不愿意接受“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观点，不愿意接受“国族是国族，民族是民族”的意见，不能依据中国国情和人民意愿完成根本性的蜕变与变革，最终演化为彻头彻尾的“放任主义”、“分裂主义”，也就注定将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必然伴随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一同退出历史舞台。

**“自决”、“分治”与“同化”、“融合”两种民族主义路线之争，是我们认识和评价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乃至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治的理论武器和思想钥匙。**

国民党内“民族主义”路线上的分歧与纷争，影响甚至左右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趋势和走向。1929年，国民党于国共分裂之后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强调“在民族主义基础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

---

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572页。

<sup>1</sup> 蒋介石：《中国魂》（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59页。

<sup>2</sup> 蒋介石：《中国魂》（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59页。

<sup>3</sup>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47页。

<sup>4</sup>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52页。

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在民权主义基础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与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在民生主义上，乃求发展国内一切人民之经济力量”<sup>2</sup>。该决议等于否定了国民党一大宣言所确立的“民族自决”主张。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蒋介石的主导之下发表了《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又再次重申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的“诺言”，虽未明示但暗含承认“民族自决”之意，但宣称“唯抗战乃能解除压迫，唯抗战获得胜利，乃能组织自由统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sup>3</sup>。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大背景之下，主张“国家统一”的“融合论”逐渐占据上风，国民党“五届七次中央全会”（1940年7月）、“五届八次中央全会”（1941年4月）、“五届九次中央全会”（1941年12月），皆有委员提出“国族团结”、“民族团结”等提案和施政纲领并获得通过，实际上否定了1938年临时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相关决议。

认清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双面一体”性，对于我们加深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研究中留有的迷局和疑问，无疑大有裨益。我们曾经将蒋介石集团民族政策的摇摆、反复解释为“虚伪性”——这种“虚伪”其实更多应视为是一种在“融合”与“分治”的天平之间的摇摆和调适。我们曾经认为蒋介石集团的民族政策是“反动性”的民族政策，但是我们批判反动性的标准往往单纯地以其“融合主义”的一面为依据，恰恰忽略和忽视了其“分治主义”一面的反动性。国民党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之下通过的时而“融合”时而“分裂”，时而“平等”时而“同化”的决议、提案，国民政府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之下采取的时而“融合”时而“分裂”，时而“平等”时而“同化”的政策、措施，难以形成统一的、长期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反复无常，摇摆不定，其根本原因不过是蒋介石集团“两面一体”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国民党内部在民族主义内涵和路线上的分歧，造成政府和具体操办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尤其是重大战略决策时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只能在“融合”与“自决”（分治）的两条道路上相互倾轧，进退维谷，自寻绝途。

**历史证明，肆意伪篡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

建立在传统儒家学说、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蒋介石“民族主义”，不仅没有“继承”而且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新民族主义”的“遗训”，加剧了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强化了“中心”—“边缘”的政治模式，具有无法弥补的理论缺陷和政治陷阱：“融合主义”的“民族主义”违背各族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现实和要求民主、自由、自治的历史大势，不可能得到各族群众衷心拥护；“分裂”、“分治”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以降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异曲同工，只会加剧而不是减缓现代中国分崩离析的国家危急。民国

<sup>1</sup> 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47—149页。

<sup>2</sup>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1929年2月27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页。

<sup>3</sup>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67-468页。

时期民族政治的历史告诉我们，“融和”、“同化”与“自决”、“分治”虽在政治目标和主观愿望上背道而驰，但在政治理论上，尤其是在蒋介石的政治思想体系之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之中竟然是如此紧密地联系、结合在一起，双面一体，密不可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文化、语言的差异和血缘、地域之别，判定国家的“内—外”，民族的“我—异”，情感的“亲—疏”，利益的“核心—边缘”的思维模式，是“同化”、“融合”与“分治”、“自决”共同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出发点。蒋介石集团的失败教训也告诉我们，罔顾人民意愿和基本国情去追求狭隘的文化统一和民族融合；罔顾人民意愿和国家命运，去以文化、血缘基础之上的“民族”划定“国家”边界、构建“民族国家”，是多么危险的政治冒险！也许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在民族政治领域带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政治教训和最深刻的历史警醒。

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才能肩负起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构建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和使命。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132期均可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本《通讯》介绍的文章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编者观点。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